

2008 年度神奈川大学日本常民文化研究所
非文字资料研究中心第 4 次公開研究会

探索租界研究的新的可能性

—上海研讨会—



日期 / 2009 年 3 月 28 日（星期六）10:00~17:00

会场 / 上海文庙会议室 中国上海市文庙路 215 号

主办： 神奈川大学非文字资料研究中心
东华大学人文学院



探索租界研究的新的可能性

—上海研讨会—

《安排》

日期：2009年3月28日（星期六）10:00～17:00

会场：上海文庙会议室（地址：中国上海市文庙路215号）

主持人：大里浩秋（日本・神奈川大学）陈祖恩（中国・东华大学）

【报告】 10:10～ 各20分钟

- 1 《字林星期周刊》与中日关系史—以北伐战争与济南事件为例 （孙安石・神奈川大学）
- 2 利用“战前中国境内‘外国人’人口统计数据库”的地域人口分析
—针对民国、满洲国时期的研究 （贵志俊彦・神奈川大学）
- 3 上海租界与韩国人 （金光载・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

【评论】 20分钟

上海史研究的新视点 （陈祖恩・东华大学）

【讨论1】 30分钟

＜午餐（孔乙己餐厅）・文庙参观＞ 12:00～

【报告】 13:30 ～ 各20分钟

- 4 时代的符号，文明的印记
—晚清上海，天津租界欧美建筑文化遗产初探 （罗苏文・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 5 在中国和韩国的旧钟纺社宅地的调查报告 （冨井正宪・韩国・汉阳大学校）
- 6 仁川日本与清国租界地 （韩东洙・汉阳大学校）
- 7 汉口的日本租界地的保存和再生 （李百浩・武汉理工大学）

【评论】 20分钟

租界和建筑的研究 （徐苏斌・天津大学）

【讨论2】 30分钟

【全体讨论】 60分钟

大里浩秋 陈祖恩

前言

针对过去在中国，朝鲜，日本等东亚各国中设置的租界，租借地，居留地等的相关研究，是近年历史研究的成果中，争论最热烈报告最活跃的领域之一。

以租界与租借地相关问题的研究作为共同课题的我们的研究小组，在 2003 年到 2008 年这段期间，参加了神奈川大学 21 世纪 COE 项目《人类文化研究中非文字资料的体系化》的第三班《环境和景观的资料化和体系化》的研究。

这次研究成果的一部分，在《在中国的日本租界研究》和《进入中国的日本企业和有关建筑——从战前的纺织业为例》的二次研究会上进行了发表。之后，继续参加了于 2008 年设立的神奈川大学非文字资料研究中心的活动，直至至今。

此次的上海研讨会是神奈川大学非文字资料研究中心与东华大学人文学院共同主办的活动。

针对迄今为止关于租界的种种相关研究与成果和对租界老旧建筑物的保存与保护，中国，韩国，日本的研究者们纷沓集聚在一起，在各抒己见报告论述各自最近的研究状况与为保存而付出的努力状况与现状的同时，也是为今后展开关于租界的新的共同研究的可能性，而进行摸索的一次机会。

籍由此机会特别感谢上海文庙的相关友人提供了如此优越的会议条件与热情款待，并同时为表达在下对参加人士的热烈讨论的衷心期待，特拙笔写此前言。

神奈川大学非文字资料研究中心研究员 大里 浩秋

《字林星期周刊》与中日关系史—以北伐战争与济南事件为例

孙 安石（日本神奈川大学）

sona0001@hotmail.co.jp

1. 前言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戈公振就曾在其概述中国近代报业诞生发展过程的名著《中国报学史》（1928年）中，指出了欧美传教士所起的重要作用，特别是有关中外贸易的商业信息，以及有关中国国内动荡政局的信息成为关心的焦点这一事实。近来，由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对外开放政策的影响，从政治经济信息的获得及传媒的作用这一视点出发的传媒研究，再次受到瞩目。

例如，Barbara Mittler 所著的《A News Paper for China》（哈佛大学，2004年）借用“公共领域”这一概念，以在上海发行的《申报》为素材，对清末1872年至1912年间的中国报纸的作用，做出了精湛的分析。XianTao Zhang 的《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Chinese Press》（劳特利奇出版社，2007年）则具体论述了清末传教士对中国近代报纸诞生的影响。此外，Joan Judge 的《Print and Politics》（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6年）率先对《时报》进行了整理分析；而 Rudolf G. Wagne 则在其《Joining the Global Public》（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2007年）中，介绍了在此前的报纸研究中不太被提及的小报。

本次报告，希望借鉴以上中国传媒研究的新动向，介绍发行于上海的英文报纸《The North 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and Consular Gazette》（以下，记为《字林星期周刊》）对1927、28年的北伐战争及日本向山东济南派兵的报道，以窥上海英文报纸对日中关系史报道一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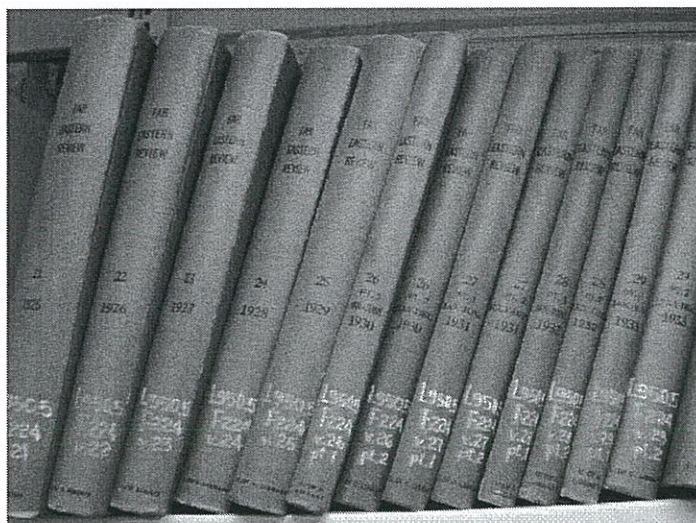
2. 中国的英文报纸：《远东时报》与《字林星期周刊》

欧美传教士在中国发行的近代报纸，对中国的近代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此，学界已经没有任何异议。正如许多研究者已经指出的，创刊于上海或北京的《教会新报》、《中外新报》、《中西闻见录》等报纸，对欧美政治、哲学、以及科学技术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而与此相对的另一个流向的存在，即中国的各种信息以欧美的报纸为媒介流向欧美，也是不争的事实。前言中提到的 Barbara Mittler，以1907年刊登于《申报》的插图为依据，指出了宫廷内密经外国的报纸而流传于中国民间这一途径，在清末已经成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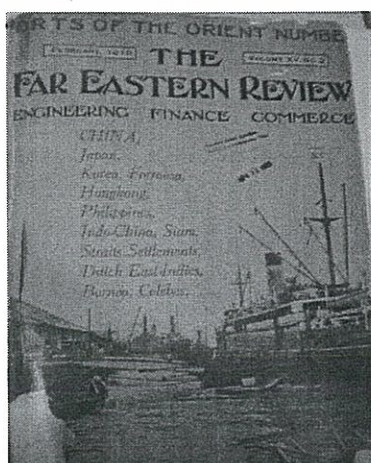
在理解中国及东亚的近现代史时，发行于中国的英文报刊的作用尤不可忽视。而其中又以《The Far Eastern Review Commerce, Engineering, Finance》（以下，记为《远东时报》）和《字林星期周刊》两报，存在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40年代的较长时段，又对居住于租界的外国人社团有着较大的影响力，因此特别值得关注。

【图1】美国俄勒冈大学骑士图书馆 (Knight library) 所藏《远东时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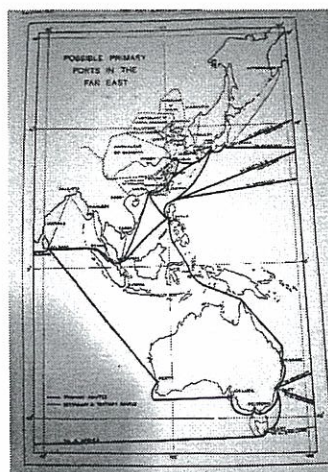


《远东时报》(1904~1942年?), 以上海、北京、横滨、马尼拉为据点发行, 每期60页左右, 主要面向欧美, 报道欧美开展于亚洲各国的最新产业信息, 以及中国、日本、菲律宾本国的产业动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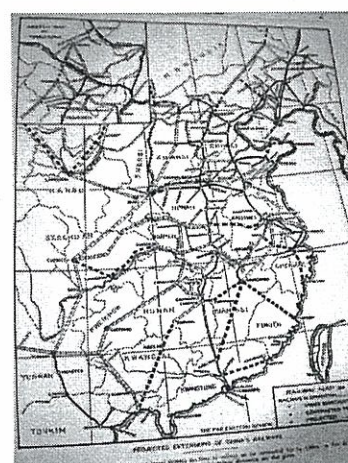
值得一提的是《远东时报》的各种专辑, 包含论说、统计、图版、地图等, 内容详尽。譬如, 1919年2月的“亚洲港湾专辑”(Port of the Orient Number), 共有156页, 以与铁路运输相连贯的角度强调了港湾开发在商业与产业发展中的必要性。该专辑还同时刊登了有关中国进出口税务的《China's Taxation of Imports and Exports》, 介绍中国矿藏资源的《China Mineral Resource》, 以及说明中国机器设备市场的《Chinese Market for Machinery》, 并指出了中国纤维、运输、制糖、电力、通信管线等各产业部门内需扩大的情况。此外, 在《中国的贸易路线》(The Trade Routes of China)一文中, 论述了由上海至镇江、南京、九江、汉口、长沙、沙市、重庆长江沿线港湾的现状与未来, 介绍了上海值得瞩目的纺织业, 并以5页篇幅描述了中国资本的江南造船厂与英国资本的上海英商和丰船厂(Shanghai Dock and Engineering. Co)在中国造船业的霸权之争。



“亚洲港湾专辑”封面



专辑中的“远东港湾图”



专辑中的“中国铁路计划图”

如果说《远东时报》主要是以上海为中心，用英语介绍了中国和亚洲各国的贸易关系，那么《字林星期周刊》（1868 年～1941 年？）则主要是以外国人为对象，报道了中国的政治状况，以及居住于各地口岸租界的外国人的政治、经济、社会、体育等活动。

【图 2】美国俄勒冈大学骑士图书馆（Knight library）所藏《字林星期周刊》



在 1925 年前后，《字林星期周刊》的体裁有了大幅的变更，变更后的主要栏目及内容，以 1927 年 5 月号为例，所示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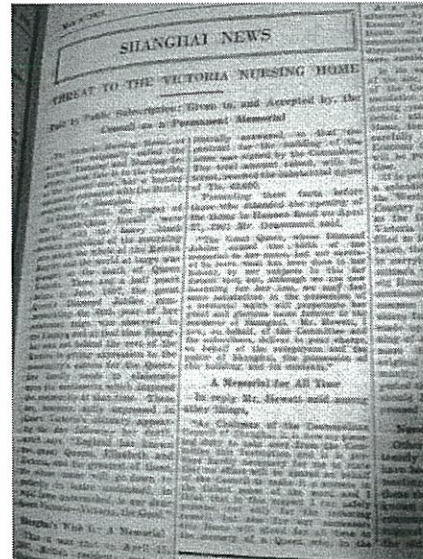
目次（1927 年 5 月号）
<u>Chinese Politics</u>
<u>Leading Article</u>
Note and Comment
Radio
<u>News from the Out Ports</u>
Correspondence
Sport and Pastime
Meeting
<u>Commerce and Finance</u>
<u>Law Report-----H. M. Supreme Court, H. M. Police court,</u>
<u>U S court, French court, Provisional court</u>
Personal Note

Foreign Telegram
Special Article
Book Page
Woman's Page
Shipping News
Births, Marriage and Deat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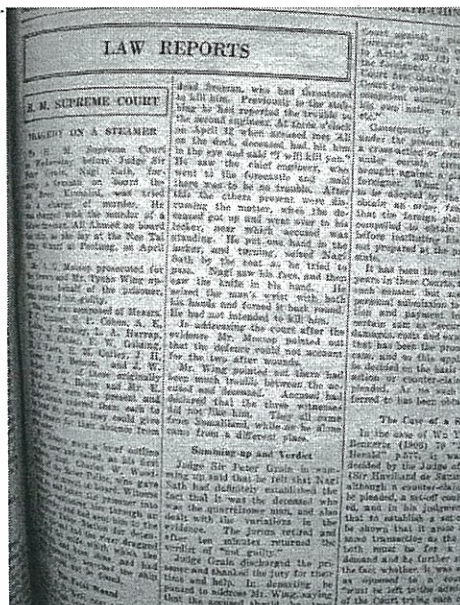
值得注意的是,《字林星期周刊》刊登了许多租界中英、美、法各国领事裁判的判决,以及外国与中国政府混合裁判的经过与判决结果,可以说为今后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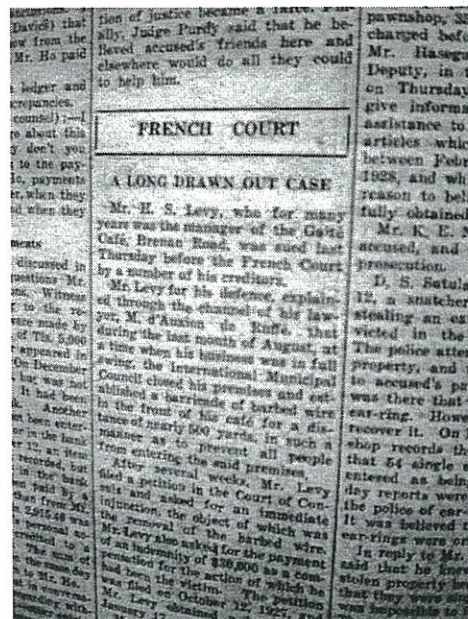
Chinese politics (1928 年 5 月 5 日)



Shanghai news



H.M. Supreme Court



French court

以上，简单介绍了上海发行的两种英文报纸《远东时报》和《字林星期周刊》的一些基本情况。下面，将具体以 1927、1928 年日本向中国山东济南派兵这一事件为例，探讨一下《字林星期周刊》的报道态度和方式。

3. 1927 年的北伐战争与日本向山东济南的派兵

进入 20 世纪以后，直到 1970 年代，所谓日中关系，基本上是冲突与对立，以及战争等不友好关系的反复。在理解同期的日中关系史时，这是一个基本认识。而造成这种不友好关系反反复复的一个决定性的契机，可以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第一次向山东派兵，并向袁世凯政府提出所谓“二十一条”的这一系列事件。

除继承德国在中国的一切权益之外，承认满铁的特权，聘请日本人担任中国政府政治、经济、军事顾问等，这样在广泛领域的对日本特权的要求，实际表明了“二十一条”对中国的“侵略”实质。这一点已经再三为人们所确认。

“二十一条”成为之后 1919 年“五四运动”，以及 1925 年上海“五卅运动”的导火索。对中国人而言，“二十一条”在当时以外来冲击的形式刺激了国人实现民族革命的潜意识。

在国民革命的高昂热情中，蒋介石于 1926 年 7 月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以后以短短两个月时间攻陷了重镇长沙与汉口，至第二年 3 月，更将南京、上海、苏州、广州等要地纳入掌握之中，开始计划建立新的中央政权。无需讳言，北伐战争的过程，也意味着意图建立新政权的国民革命军与北京政府的旧势力，以及地方军阀之间的军事冲突。

然而，对于已经从中国的北京政府那里获取了众多特权的列强，北伐的成功意味着他们将要重新与中国的新政权进行各种交涉。因此，北京政府与北伐军的军事动向，成为以中国沿海口岸各租界为根据地的各国列强关心的焦点。希望扩大在中国的特权的日本，也不例外。但与欧美各国不同的是，日本认为北伐的混乱局面带来了进一步扩大权益的机会，并积极计划干涉中国的国内政局。

按照日本方面的理解，因为中国当局无法尽到保护外国人的生命安全及财产的责任，所以日本迫不得已由本国派出军队，并在局面恢复平静之前驻屯的做法，参照之前的国际惯例，完全没有问题。

(1) 日本方面报纸的论调—居留民生命财产的保护 (省略)

(2) 中国方面报纸的论调—以《申报》为例

那么关于 1927 年日本向山东派兵，中国方面报纸又是如何报道的呢？有关的《申报》报道，按其内容，可以大体分为以下几种：

- 1, 关于日本向山东派兵事实的报道;
- 2, 对中国政府所持态度的报道;
- 3, 对日本政府所持态度的报道;
- 4, 对中国各地抗议活动的报道。

《申报》从5月26日起,以《日本将派兵赴济並占胶济铁路》(5月26日)、《日本对华出兵何为》(5月27日)、《日本政府决定派兵警备济南》(5月28日)等报道了日本向山东派兵的消息后,于5月29日集中报道了日本政府的態度(《芳泽声明出兵原因》、《日本外务省发表声明书、以保护侨民为出兵借口》《日本政府出兵山东声明原文》)。

但是,对日本向山东派兵的具体情况,《申报》却迟迟没有报道。直到6月初,才在《青島兵登陆之交涉》(6月6日)中,比较详细地介绍了日本军登陆的状况。根据此文,日本军在内外棉纱厂驻有两个大队,在青島纱厂及青島纺纱厂各驻有一个大队,另外加上驻屯于青島的日本人中学校及小学校的第二遣外舰队联合陆战队队员约500名,共有兵力约2000名左右。

对于日方的行动,《申报》除刊登《北京外部向日相抗议、谓出兵山东系背条约、侵主权之行东》、《伍朝枢向日相抗议出兵原文》(以上、6月3日)等中国政府发表抗议的内容外,还在7月8日的报道中特别强调了日本的派兵受到了国际社会的谴责(《田中决定对华干涉、青島日兵开赴高密、英美亦援例派兵青島》、《使团注意胶济日兵 ▲英美继日派兵青島、▲美使质问北京对日主張、▲使团谓日本开各国先例、▲将来使中国第二巴尔干》)。

但是,从整体来看,《申报》对于日本向山东派兵的报道,无论是质还是量,都并非大大胜过在上海发行的《字林星期周刊》。以下,对《字林星期周刊》就国民革命期间日本向山东派兵及向济南派兵(“济南事件”)的报道做一简单的梳理。

(3)《字林星期周刊》中的国民革命—混乱与暴力

这里首先要重申一个重要的基本前提。这就是《字林星期周刊》,是上海租界利益的代言人工部局的言论机关。正因如此,《字林星期周刊》强烈反对可能侵害租界利益的行为。

这一点,可以在对1927年3月24日北伐军攻打南京时发生的袭击外国人及领事馆的事件(也被称为“南京事件”)的处理过程中得到清楚的确认。发生于南京的这一暴力事件的最终解决,是在第二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最终全面接受美方的要求,同意就事件的发生而谢罪,保证不再发生同类的事件,并就赔偿问题成立共同调查委员会,双方达成和解。就这一结果,《字林星期周刊》所关注的,不是中国方面出于道德责任(Moral responsible)的理解方式,而是国民政府最终接受了欧美国际法的逻辑这一事实(《Nanking and America Agreed》1928年4月7日)。

【图 3】《字林星期周刊》1928 年 4 月 14 日



【图 3】是济南事件之前 1928 年 4 月 14 日刊登于头版的插图。讽刺性的描绘了中国在北伐过程中以武力收回在汉口的英租界，并将下一个目标转向法租界的状况。

《字林星期周刊》最为重视的，是统帅国民革命军的蒋介石发表的声明“国民革命军绝不搞排外主义。国民党和革命军保证维护外国人的生命与财产”(Manifesto by General Chiang Kai-Shek to the Powers, 《字林星期周刊》1928 年 4 月 14 日)。

从以上《字林星期周刊》的基本观点来看，1928 年的济南事件，是继南京事件的中国方面的又一“暴行”。

【表 1】《字林星期周刊》济南事件报道的标题与内容

1928, 5, 12	The Sino-Japanese Clash, Pre arranged Chinese Plan,	they(Japanese) will act strictly on the defensive, they are not for Occupation
	Events of Saturday, May 5, two china protest to Japan	
	Events of Sunday, May 6, Stern measures by Japan	
	Events of Monday, May 7, 13000 Japanese to ShangTung	
	Events of Tuesday, May 8, Fighting breaks out again	
	Events of Wednesday, May 9,	
	Events of Thursday, May 10, Two more encounters	
	Events of Friday, May 11, Tsinan City Captured after severe fighting	Whole area cleared of southern troops, Japanese occupying railway, diplomats exercised about safety of road to Peking

	Leading Article-The Tsinanfu Explosion	We have said that all considerations taken together must lead us to the view that the <u>Japanese were attacked, not the attackers.</u>
1928, 5, 19	The Second fight at Tsinan, severe fighting and Heavy casualties	
	Events of Saturday and Sunday, May 12-13, Chinese official report on attack of Tsinan	
	Event of Monday, May 14, Japan losing patience under calumnies of Nanking	
	Event of Tuesday, May 15, Japanese terms for settlement of Tsinan Affair, condign Punishment of Guilty, Apology by Chiang Kai-shek, Guarantees and Reparations, Further Use of Railway	
	Events of Wednesday, May 16, League of Nations and Tsinan	Though the affair is quite clear and <u>Foreign Powers have already recognized the justice of the Japanese troops' action and there is no fear of foreign Powers being misled by Chinese propaganda.</u>
	Events of Thursday, May 17, Great Britain and the China crisis	
	Events of Friday, May 18, Japanese business men's policy to China defined	
	Leading Article-THE Judgement on Tsinan	<u>We are not specially interested in defending the Japanese. ...But right is right wrong is wrong and the hysteria of the Chinese outcry make one's gorge rise.</u>
	<u>News from Outports- What Japan bore at Tsinan</u>	<u>While there are few who still abuse the Japanese, the great majority of foreign opinion here is that Japanese had endured insults and outrage ...</u>
1928, 5, 26	Events of Saturday, May 19, Initial successes of Fengtien at Wangu on Kin-Han line	
	Events of Sunday, May 20, Chang Tso-lins' reply to Japanese invitation to retire	
	Events of Monday, May 21, Peking's dignified reply to the Japanese Memorandum	
	Events of Tuesday, May 22, Japan's New attitude to Peking	
	Events of Wednesday, May 23, success claimed by Fengtien in both Fields	
	Events of Thursday, May 24, <u>American warning to Nanking</u>	<u>Lawless Uncontrolled forces will not be allowed to approach Tientsin</u>
	Events of Friday, May 25, serious fighting, reported from the Kin-han Railway	
1928, 6, 2	Events of Saturday, May 26, neutralization of TsinTao	

	Events of Sunday, May 27, Heavy fighting in the North	
	Events of Monday, May 28, Northern blow at Feng Yu-Hsiang	
	Events of Tuesday, May 29, Japan's statement on Tsinan to League of Nations	
	Events of Wednesday, May 30, Fengtien in flict reverse on Shansi	
	Events of the Thursday, May 31, Chang to defend Peking	
	Events of the Friday, June 1, Compromise put to the Marshal Chang	
1928, 6, 9		
1928, 6, 16		
1928, 6, 23		

【表1】整理了1928年5、6月《字林星期周刊》报道济南事件的文章标题与内容，可以看出其正式观点是支持日本的。

那么，与对这一事件的报道相关连，《字林星期周刊》又注目了那些其他的情况呢？其中之一，是对日益蔓延的中国方面抵制日货的运动可能对上海对外贸易的全体产生的不良影响，深感忧虑。

【图4】《上海的热焰》(Shanghai Blows off Steam)《字林星期周刊》1928年5月12日



例如1928年5月19日的《上海市场报告》(Shanghai Market Report)中，《字林星期周刊》对中国方面的动向作了以下预测：

“毫无疑问，本次的济南事件将引发抵制日货的运动。前次的抵制日货运动可以说并不彻底，而本次虽然口头上没有大的动静，但很可能会是对日货的彻底排斥。如果持有日本股份

的中国人抛售股份，日本股份将大幅下落。”

该文还十分警惕地指出，抵制日货运动有可能不仅仅限于上海一地，而波及到香港、汉口、北京等全国各地，从而发展为全国规模的排外主义。

1928年5月26日的《外埠讯息》(News From the Out Ports)栏目中，刊登了《中国南部与济南事件》一文，详细地描述了“在香港的抵制日货运动日益高涨，港湾中日本货物的流通陷于停滞，日本店铺遭受投掷石头等损害，事态不断恶化。抵制日货运动将进一步扩大至广东等中国南部各省”的状况。同日的《广东自发的抵制》(Boycott at Canton spontaneous)则对广东抵制日货的情况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当然，《字林星期周刊》注目于租界所在的中国沿岸各地日益扩大的抵制日货运动，是出于对该运动发展为广泛的排外运动的担心。

4. 结语

以上，简单介绍了上海的英文报纸《字林星期周刊》在1927~1928年期间对日本向山东和济南派兵的报道。

作为上海租界外国人权益的代言人，《字林星期周刊》十分警惕可能导致中国沿岸各地的列强权益遭受侵害的动向，严厉地批评了北伐战争带来的中国国内的混乱局面。虽然深知日本企图扩大在中国权益的意图，但在其行为与租界的利益没有产生正面冲突的情况下，并没有展开对日本的直接谴责。

《字林星期周刊》在1928年5月26日，以《美国对南京政府的警告》为题，警告说“在中国北部军事冲突的危险如此显著的混乱局势下，我（驻上海美国总领事）希望就以下问题唤起你（南京政府外交部长黄郛）的注意。现在，避难于天津的美国市民有数千名。出于防卫之目的，美国政府有着驻屯军队，保护美国市民生命的义务。”这可以说与《字林星期周刊》坚持的报道姿态是一致的。

当然，《字林星期周刊》对中国报道的态度，在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后，发生了重大的转换。日本与中国的军事冲突，已经严重影响到租界的利益，使得欧美各国再也无法保持旁观者的姿态了。

最后，在准备本次报告的过程中，有两个问题希望能与各位同仁分享。

第一，关于《字林星期周刊》这样在上海发行的英文报纸，相关研究还不多，在今后的中国近现代史（上海史）研究中，相信它还会提供更多的新的事实。例如，1928年6月9日《公园中的中国人》(Chinese in the Parks)介绍了租界公园对中国人开放的过程，并附有照片。而《明园的惊险一幕》(Thrilling Scene at Luna Park, 1928年6月2日)则生动地描绘了1928年4月开始营业的明园(Luna Park)举行跑狗比赛的情景。

第二，《字林星期周刊》对于中国的传媒史研究，也提供着重要的事实。例如，作为该报插图画家留下了众多作品的 Sapajou，以及摄影师 H.S. Wong（万国通信社，International newsreel）及 Zetterland 等的活动，在今后的报纸研究上是急需探究的课题。

我的报告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利用“战前中国境内‘外国人’人口统计数据库”的地域人口分析 ——针对民国、满洲国时期的研究

贵志俊彦
(神奈川大学)

1. 就数据的基础资料的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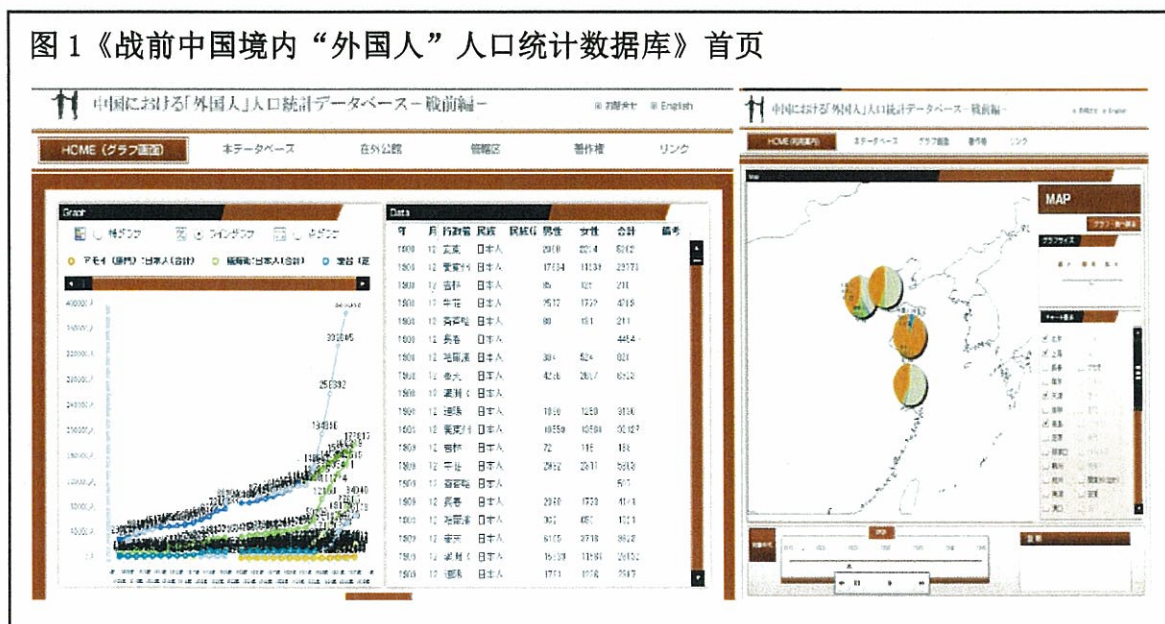
本论文中所使用的数据资料均来源于《战前中国境内“外国人”人口统计数据库》，图1就是数据库首页。这个数据库于2008年3月公布，可以通过此网站访问(<http://area.net.cias.kyoto-u.ac.jp/statistics/>)¹。

在介绍数据库及网站的使用方法并给出实例之前，先就有关数据的几个基本问题进行一下分析。

首先，我们用的资料是2004年出版的8卷《战前期中国在留日本人统计》。这个统计资料包括如下几部分内容：

- ①日本驻中华民国及满洲各领事馆实施的人口普查的结果；
- ②领事馆管辖区人口数逐年变化情况；
- ③日本、朝鲜、台湾男性及女性的人数推移；
- ④住华外国人的口变化情况；
- ⑤满铁沿线及开放地区内的中国人人口数量。

图1《战前中国境内“外国人”人口统计数据库》首页



¹ 这一数据库和网站的建立，是京都大学田中耕司教授主持的研究课题《通过共享亚非多元化信息资源的地域研究的新起色》，以及笔者主持的研究课题《关于17-20世纪东亚地区“外国人”的法律地位综合研究》的共同研究成果，并且这项研究成果的取得得到了日本学术振兴会科研经费的支持。

我们在网站设计过程中，重点突出③和④两部分内容。

其次，《战前期中国在留日本人统计》这份资料的附录部分还有日本驻外公馆调查整理的《人口统计表》。《人口统计表》的名称和内容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²。

日本外务省早在 1908 年日俄战争爆发时，就在关东州及满洲进行过人口普查，而日本国内的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是在 1920 年。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它比日本的人口统计还要早。年末，外务省总务局出版了第 1 期《关东州并满洲在留邦人及外国人人口统计表》，这个名称一直使用到 1924 年的第 17 期。

在外务省决定调查“在留邦人”及“外国人”的范围扩大至中华民国时，外务省亚洲局则把 1925 年末出版的第 18 期的名称进行了更换，更名为《支那在留邦人及外国人人口统计表》。

1932 年 3 月满洲国一成立，名称再次被改动为《满洲国及中华民国在留邦人及外国人人口统计表》。1937 年，随着满洲国废除治外法权，外务省放弃了对满洲国进行人口普查。1938 年以后，外务省不再把满洲国列为人口普查对象，并决定从 1940 年起，将统计表的名称改为《中华民国在留邦人及第三国人人口概计表》。

1942 年 11 月日美正式宣战，日本政府在这时新成立了大东亚省，代替外务省来接管中华民国人口普查业务，并将这项工作一直持续到 1944 年 7 月。

2. 战前日本驻中国在外公馆与人口普查情况

现在，日本驻中国各地的在外公馆包括：在北京的大使馆，在上海、沈阳、重庆、广州、香港等 5 个城市的总领事馆，以及在大连的驻在官事务所，合计共有 7 处，分布在中国 7 个城市。

而在战前日本驻中国各地的在外公馆最多时候，有公使馆 1 处，总领事馆 26 处，领事馆 28 处，领事分馆 25 处，各分支驻在官事务所 6 处，分布在中国的 81 座城市，数量是现在的 11 倍。这个数字反映了当时的日本政府对政策的重视程度。日本最早的驻华总领事馆在上海建于 1872 年，同年中国也在日本设立了外交公馆。

下面我们来分析日本驻华领事馆的逐年推移情况³。

1894 年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驻中国在外公馆包括在上海、福州、天津、汉口等 4 个城市的总领事馆，厦门和芝罘 2 处领事馆，合计 6 处，分布在 6 个城市。甲午战争爆发后到中华民国成立的前一年，即 1894 年至 1911 年间，日本除在重庆、奉天、哈尔滨、齐齐哈尔、间岛设有总领事馆外，还在其他地区增设了 25 所驻外公馆。从地理分布特征看，这些新增驻外公馆基本都是选在南满铁路沿线地区或长江沿岸地区。

² 木村健二·幸野保典幸：《战前期中国在留日本人统计：解题》，《战前期中国在留日本人统计》第一卷，不二出版，2004 年，8-11 页。

³ 参照：《战前期中国在留日本人统计》全八卷，关联统计表；副岛圆照：《战前期中国在留日本人口统计（稿）》，《和歌山大学教育学部纪要-人文科学-》第 33 集，1984 年；和田华子：《第一次世界大战後における日本外交と在外公館》，《人间文化论丛》第 8 集，2005 年。

此外，1912 年中华民国成立，到 1937 年日中战争之前间，日本在山东的青岛、满洲的吉林、内陆成都设立了总领事馆。1932 年满洲国的成立，使日本把视线扩大到满洲边境地区，并在这些地区建立了 3 所领事馆和 9 所分馆。福建省的厦门、广东省的广州、江苏省的南京领事馆，被升格为总领事馆。

从 1937 年日中战争爆发，到 1945 年终战期间的在外公馆的分布情况参见图 2。其中黑圈代表公馆或大使馆，红圈代表总领事馆，黄圈代表领事馆。因为在外公馆数量太多，因此领事分馆和分支驻在官事务所在此图中省略没有标出。这个时期，日本除在内蒙古的呼和浩特、河北省的石家庄、山西省的太原、安徽省的蚌埠、江苏省的徐州、海南岛的海口新设立了总领事馆外，还将杭州、九江、张家口升格为总领事馆，并增设了 8 处分馆，2 处驻在官事务所。

图 2 战前日本全部驻中国在外公馆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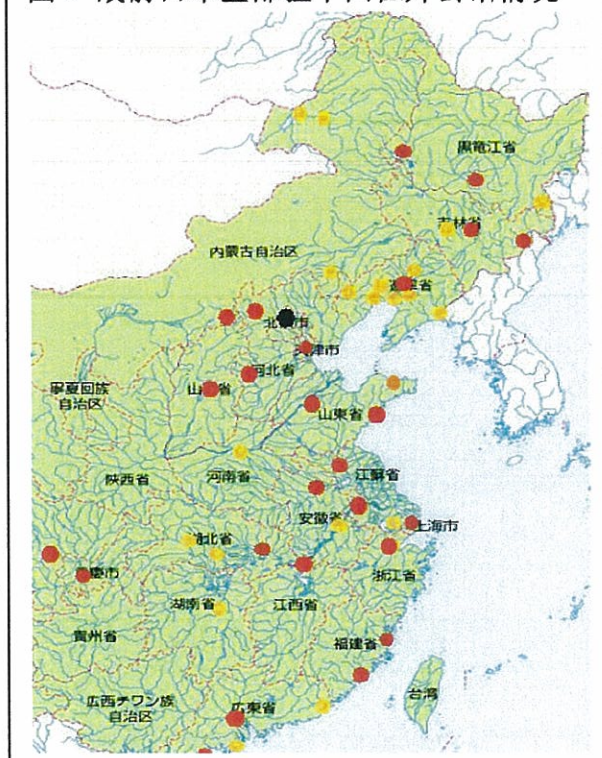


图 2 包含了战前日本全部驻中国在外公馆情况。显而易见，这些都集中在日本侵华占领地和它所关心的满洲、华北沿海地区、华中的长江流域，而华南地区相对欠缺。在这张地图上，已经充分地表明了当时日本对华政策的关注点。

从中华民国境内各领事馆的管辖范围来看，有像厦门领事馆那样只管一市的，也有如汉口总领事馆那样，管辖范围达到 124 个市县的，并且各区域的幅员范围也各不相同。根据统计可知平均一个管区管辖 36 个县市，可见管理范围并不小。而且各领事馆的业务负担量也相差悬殊。

在满洲国的领事馆的管辖范围或是与省界一致，或是两个领事馆划分管辖一个省份。例如：安东领事馆、锦州领事馆、间岛领事馆的管辖范围几乎都和省界一致；奉天省是由营口领事馆和郑家屯领事馆各管辖一半，而吉林省则成为吉林总领事馆和新京总领事馆的管辖区⁴。

目前我们能确认，1921 年以前的人口普查项目包括“日本人”、“朝鲜人”、“台湾人”，但是从 1923 年第 16 期开始，领事馆就决定用“内地人”、“朝鲜人”、“台湾人”的划分方法，以后三者合一，称为“本邦人”。结果是，在分类上，“日本人”这一称呼从统计表中悄然消失⁵。关于这期间的经纬过程和历史意义，有待于今后进一步的研究。但笔者倾向于认为之所以发生这一变化，是因为日本从年开始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采取凝聚殖民地境内的朝鲜人及台湾人的政策。

⁴ 《战前期中国在留日本人统计》附表。

⁵ 《战前期中国在留日本人统计》第 2 卷。

总之，在战前中国境内，具体居住了多少台湾人和朝鲜人的详细资料并不多，所以领事馆的人口普查数据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

根据人口普查结果：可以了解中国境内的“外国人”流动动向。此处“外国人”的定义是“非中国人”和“非日本人”。在建立这一数据库和网站的时候，我们很重视统计表中“外国人”，因为在战前东亚地区还从来没有一份类似的资料，能如此详细地纪录“外国人”人数。从人口普查中完全可以了解出在一定的时间，在中国的某个城市，有多少某个特定国家的人口。

3. 网站的系统和操作使用方法

这个系统非常简单，介面使用了电脑动画软件。在检索时，想要显示的资源，在数据库的数据中以可扩展置标语言的形式，通过Flash提供给我们，此外网站使用京都大学地域研究统合情报中心的服务器维持运作。

图1所示，这个数据库承载了“图表的布置机能”和“地图内存(mapping)机能”。运用“图表的布置机能”时，X轴可以任意选择城市、时代、外国人国籍，Y轴表示人口数量，并且图表可以自由转换成直线图表、折线图表、点图表。

此外，图表中还有想要显示的图表的数据依据，对学者们的研究工作而言，这些罕见的数字，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使用“地图内存(mapping)机能”时，可以通过操作，在地图上把图表转换成圆形图表，演示根据时间的变化而产生的动态情况。

具体的操作方法非常简单，只有四个步骤。

第一步：设定时间。这里要用鼠标选择中华民国及满洲各段时代。

第二步：设定X轴内容。任意设定“都市”或“年代”。选择“都市”可以对各城市进行对比。选择“年代”可以显示出人口逐年变化情况。

第三步：选择中华民国及满洲境内总领事馆或领事馆。这里可以从满洲17处，中华民国31处中任意挑选。

第四步：选择人口对象。首先是总人口，可以选择“日本人”、“朝鲜人”、“台湾人”、“外国人”。对日本人、朝鲜人、台湾人还可以得到分男女的人口数。

对“外国人”只能选择国籍，此处列出世界53个国家的名单，包括了容易被中国学学者忽略的挪威、列支敦士登、门的内哥罗的人口数纪录。另外，这里还可以看到在满铁附属地及开放地区居住的中国人人数指标。

图1左边的图是图表与统计结果。两张图表在电脑屏面上即可以同时，也可以任选其一地显示出来。图1右边的图是根据检索结果显示的地图，包括北京、天津和上海。上海是外国人比较多，我们还可以通过自由操作，按照时间的变化使地图自动变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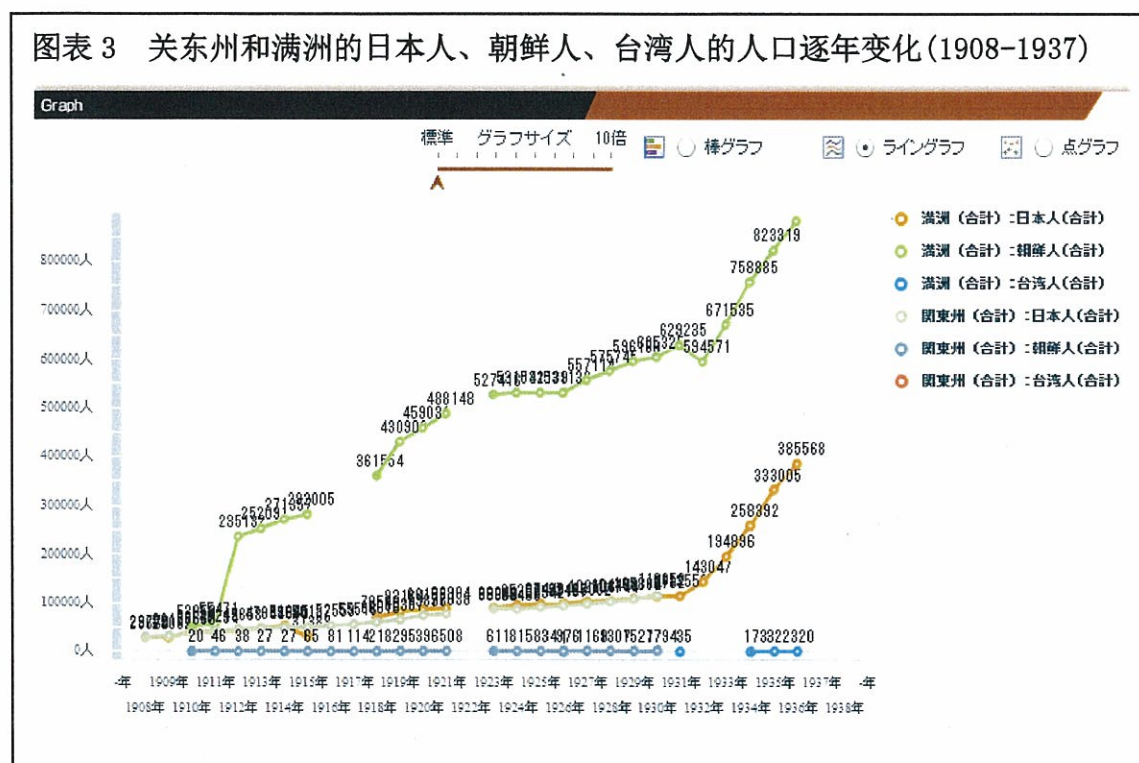
这个数据库是因为地图系统中有前进、后退、暂停等功能，所以程序系统启动后，地图可以按照所选的时间发生变化。通过时间年代的变化，可以看到日本人和外国人人口频繁流动的动向。

4. 利用数据库网站的研究实例

4.1 满洲的实例

4.1.1 日本人、朝鲜人、台湾人的变动

图表 3 反映的是 1908 年到 1937 年间，关东州和满洲的日本人、朝鲜人、台湾人的人口逐年变化情况。



可以看出，绿线所代表的满洲朝鲜人，人口增长幅度突出，1931 年以后的增长率几乎与橘红色的日本人相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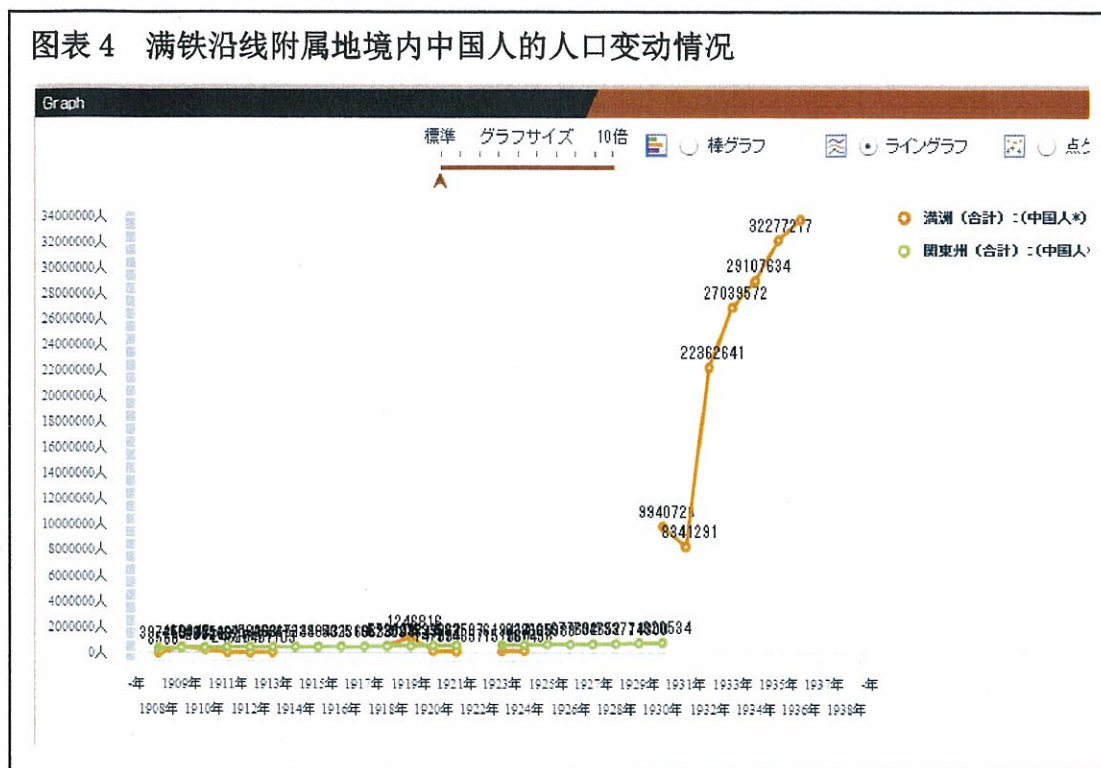
从这里可知，满洲境内朝鲜人人口快速增长，基本集中在二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1910 年的日韩合并时期，第二阶段是 1932 年满洲国成立以后。对此学术界也给予了肯定。但是深蓝线所代表的关东州境内的朝鲜人人口数量几乎没有增加，笔者认为可能是当时的朝鲜人认为，对他们而言，日本人集中居住的关东州的生活环境不适合他们。还有，浅蓝线表示居住在满洲的台湾人，这些人除从事医疗及教育工作的人员外，其他人员的变化幅度不明显。

以上内容可以看出各民族在满洲和关东州所拥有的政治地位。显而易见，从图表内容完全可以使了解到满洲国建国后，对谁来说那里最有吸引力。

4.1.2 中国人的人口变动

下图 4 反映了满铁沿线附属地境内中国人的人口变动情况。

图表4 满铁沿线附属地境内中国人口变动情况



因为数据有缺失，因此主要分析 1932 年的满洲及关东州的变化情况。这张图表表示 1932 年满洲国成立后的人口普查纪录。其中“中国人”急剧增加，笔者认为增加的这一部分人不是从外地迁移过来的，而应该是从满铁沿线附属地外围搬到附属地内的居民。因为 1937 年日本退还满铁沿线附属地前，对当地的中国人而言附属地就和各地租界一样，为逃避战争与灾难的人们起到了庇护区的机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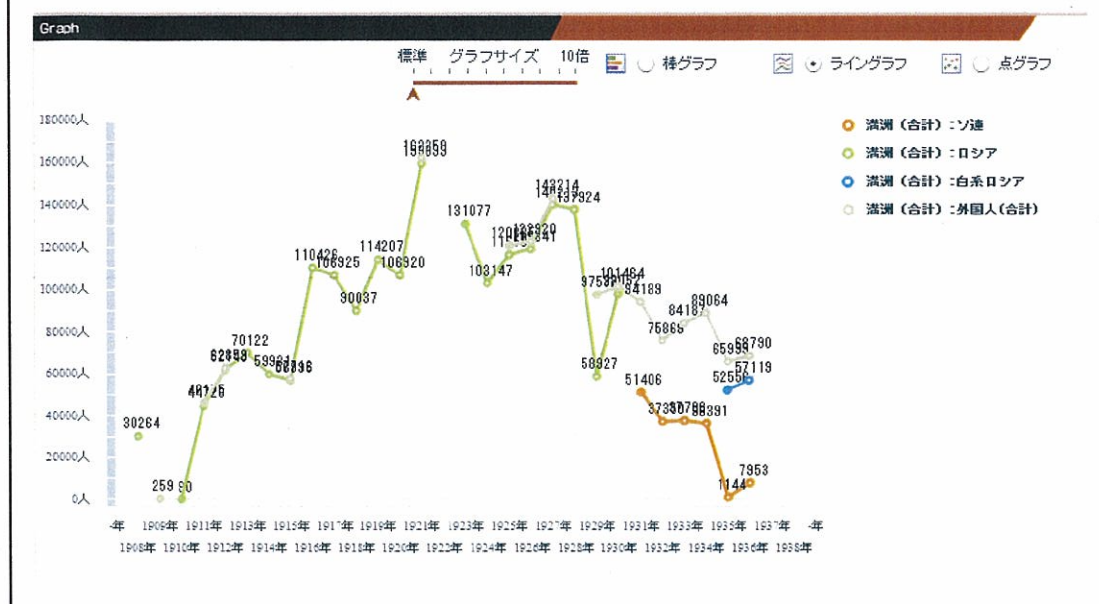
4.1.3 日本人的变动情况

由于满洲地区设有日本总领事馆，所以 1932 年以后，奉天、哈尔滨等南满洲铁路沿线一带日本人人口显著增加，而远离满洲铁路沿线的间岛和齐齐哈尔的增长率，相比之下则有所不及。对日本人来说，满铁才是他们移动的生命线，可见日本人人口的扩散与集中都围绕着它进行，这一带日本人最集中的城市是满铁总部所在地奉天，也就是现在的沈阳市。

4.1.4 外国人人口数的变动情况

1908 年到 1936 年间，外国人总数目，以及他们和俄国人、白俄人、苏联人的关系如图 5 所示。其中：灰线代表满洲境内的全部外国人。绿线代表俄国人、橘红线代表苏联人、兰线代表白俄人。图表显示，1920 年前后的外国人总数增长曲线几乎和俄国人人数增长曲线重叠。从人口规模看，满洲的外国人等于就是俄国人。此外令人感兴趣的是这些人口不是 1917 年苏联革命以后增长的，而是在 1929 年后突发的。还有，在 1931 年以后的人数统计表里，我们发现俄国人的人数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苏联人数，而白俄人数则在 1935 年以后才出现。这表明由俄国领事馆掌管的满洲境内俄国人口普查工作，在 1931 年后移交给苏联领事馆管理。

图表5 外国人总数目，以及他们和俄国人、白俄人、苏联人的关系(1908-1936)



笔者以前在有关天津问题的调查研究中曾指出，远东地区的俄国领事馆在俄国崩溃后仍在继续工作，他们直到1930年才和苏联领事馆正式进行领事级别政权移交手续。这表明在1920年前，苏联本土与远东俄国领事馆之间没有业务往来⁶。这种问题同样在日本也存在，1925年日本与苏联通过缔结日苏基本条约，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然而从1917年到1925年间，俄国领事馆与前述一样，期间仍在函馆继续工作。图表5证明了在满洲同样存在的这个问题。对此，今后我们应该更深入地进行研究。

4.2 中华民国的实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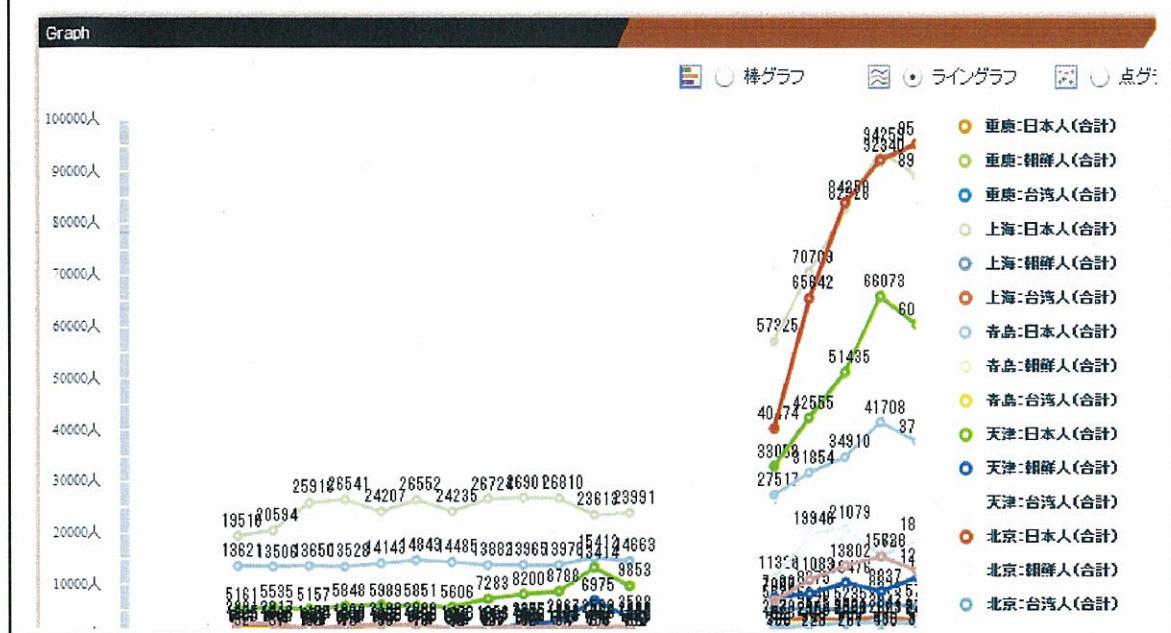
4.2.1 日本人、朝鲜人、台湾的人口变化情况

图表6所示，1924年到1944年间，在日本总领事馆管辖区内日本人、朝鲜人、台湾人的人口逐年变化情况。因为在资料中没有找到1937年到1939年的数据，所以统计值中缺少这段时期内容。在1937年日中战争爆发前，这个地区的日本人人口变化相对比较平稳。北京、上海、天津、青岛、济南等日本领事馆所在地的日本人虽有增加，但重庆、福州等领事馆管辖地的人口基本不变。朝鲜人也是如此，除开封外，其他地区基本同日本人的增减情况相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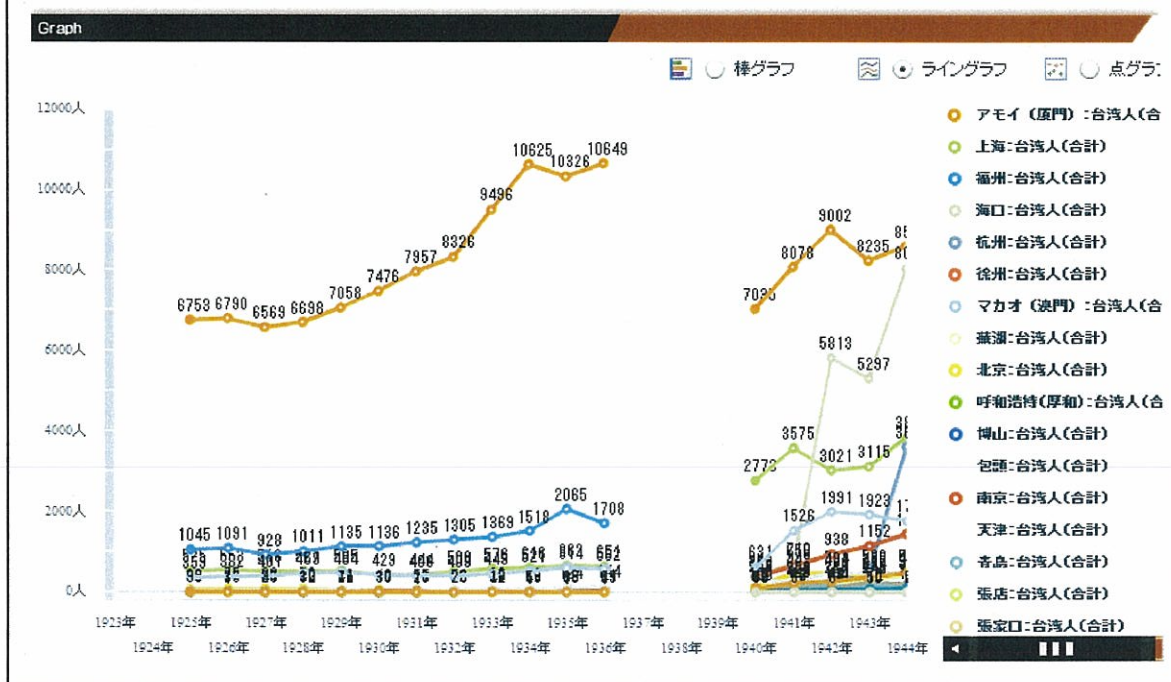
1944年终战前在中华民国境内日本男女两性的人数。从总体来看，日本人基本集中居住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地，此地人数也很突出。其次是青岛、济南、太原、张家口、南京、石家庄、汉口等地。这些城市基本都有日本总领事馆。相比之下华南地区的日本人就很少了。此外，各地的男女比例比较均衡，女性占男性的70%左右，但海南岛的海口，则是男性较多，不知是什么原因，使这里男女比例如此失衡。

⁶ 贵志俊彦志：《「帝国の『分身』の崩壊と『異空間』の創出—第一次大戦期の天津租界接收問題をめぐって—》，《近きに在りて》第39号，汲古书院，2001年。

图表6 在日本总领事馆管辖区内日本人、朝鲜人、台湾人的人口逐年变化 (1924-1944)



图表7 战前台湾人的人口分布(1924-1944)



图表7 显示的同期的台湾人的人口分布与日本和朝鲜都不同。台湾人主要集中在与台湾海峡隔海相望的厦门、海南岛的海口，以及上海、杭州、汕头、南京等地，就是说台湾人明显地和日本人及朝鲜人划分界限。但是日中战争爆发后，在厦门的台湾人人口呈减少趋势的同时，海口、杭州的台湾人则不断增加，且上海和南京的台湾人

口也有增无减。虽然现今没有人对这种反常现象进行深入研究，但笔者认为这里一定有某种重要暗示。战时台湾人和现在的台湾人一样，基本都集中住在与台湾关系密切的华南地区及长江下流区域城市。

4.2.2 外国人的口情况

图8表示的是1925年到1944年期间，中华民国境内的外国人的口情况。其中黄线表示在上海的外国人人数，占全国各城市的首位。1941年人数达到峰值，随后下降。外国人人数排在第二位的城市是国际闻名大都市香港。第三位是天津。在天津的外国人，从1937年日中战争爆发前后就已经开始逐步撤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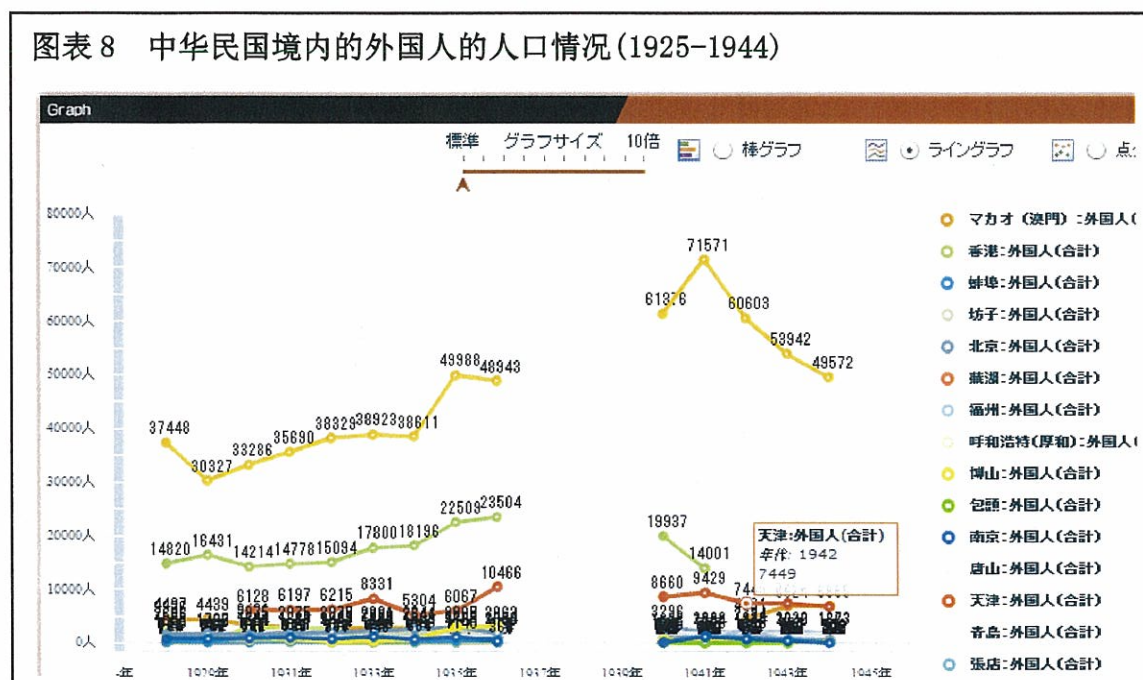


图9是同一时期在华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的人口数变化情况。1937年日中战争爆发前人口搬迁的变化不大，红线表示居住在上海的英国人的人数，灰线表示美国人的口数。1941年日美交战后，上海和天津的英国人、美国人的口数开始急剧下降。黄绿色表示居住在上海的德国人，通过与英国人和美国人比较，我们明显看出同期的德国人越来越多。此外，这一时期正是法国维希政权时期，所以浅兰色的法国人的口也有所增加。笔者推测，伴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上海从一个英国和美国的网关城市，转变成法西斯主义在远东地区的据点。上海在向法西斯主义据点城市转换过程中，把这里当作避风港居住的犹太人急剧减少。当然，我们使用此数据库还可以看到在北京、青岛、徐州、九江、汕头等地也分散地住着一些犹太人，现在还不清楚他们当时的具体活动情况。

除以上分析的在华各外国人之外，用此数据库还可以了解其他与亚洲关系紧密的国家的在华人口情况。至今为止，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对其中的一部分做了一些解释，但并没有把问题全部研究清楚。例如在上海，与其他人数更少的外国人相比，可以通

人数虽不相同,但仍可以看出他们分布在各地。右边的图是 1944 年终战前的情况。这里橘红色的日本人在外国人里面规模最大,这明确地表明了当时日本人的势力范围。通过反映 1944 年外国人情况的地图,笔者发现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即在华北和华中地区,蓝色所代表的朝鲜人的人口在两地同时增加期间,华南地区则是代表台湾人的绿色曲线不断增加。这也是今后应该深入研究的课题。

5. 今后课题

针对我们的数据库网站,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研究需要,很方便地得到许多理想的人口统计图表。因此,作为数据库网站的创建人,我们还将完善、充实并努力创建应用范围更广泛的统计系统。

最后简单地介绍一下我们正在开发的、一个应用性更广泛的人口统计数据库。为了让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用户方便使用,我们用 Google Map 代替了页面地图。这个系统可以根据全世界人口普查结果,索取上文中提及的图表和地图。这个网站的测试版于 2009 年 3 月公布 (<http://area.net.cias.kyoto-u.ac.jp/dashboard/>), 希望通过大家的广泛利用,对我们的数据库给予多方鼓励与支持。

上海租界与韩国人

金光载(韩国 国史编纂委员会)

一

最近我对有关外国侨民史最感兴趣的就是在战前上海居住的日本人之中许多人感到怀乡情结。¹这样的现象与韩国相反。虽然日本败亡以前在日军统治下在上海居住后回国的韩国人也不能没有对上海的怀乡情结，但是本人面谈的几位人士依然不想提这件事或者说得模糊不清。这是跟已忘在上海自己干的侵略行为而对第二故乡上海流行地患了怀乡病的日本人大有不同。

当然这不是在上海居住过的每个韩国人都有这样的态度。例如有些在上海做反日运动而尹奉吉的虹口公园爆弹义举以后脱出上海的革命家和其家属，对他们来讲上海的经验谈是非常骄傲的。在韩国仍然强烈存在的不是‘抗日’就是‘亲日’的观念引起这样的认识上的错误。这样否定的看法产生了让人们不但对当年在上海从事亲日活动(韩奸)的人，还对站在抗日和亲日中间的灰色地带观望而犹豫地从事生业的人戴着有色眼镜看待。因而把自己的上海经验不敢说出来。甚至居住上海的经验倒是很想隐藏的一件过去。结果他们就变成战前日本的上海统治与战后回国之后抗日`亲日的论理上的双重受害者。可是当时住在上海‘租界’的韩国人的存在样态有着以抗日`亲日的论理难以说明的复杂情况。

¹ 高綱博文，〈“我的故鄉·上海”的誕生〉，〈〈租界里的上海〉〉，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

黄浦江是长江的最后支流。上海位于黄浦江左岸，原来是一个小港口。英国人看来这个港口很有前途，所以他们从 1820 年起对上海开始进行调查。他们以 1942 年发生的阿片战争的机会作为借口，终于把上海开放了。20 世纪前半期上海成了中国最大的国际城市。

因此在上海的租界不但成了那些被压迫民族革命家的乐园，也成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跳板。而且，开港的上海是西方文化转入到中国的一个窗口。这些西方文化和思想跟中国传统的互相冲突混合。

跟今天的上海一样，当时的上海也是对韩国人特有感怀的城市。当时被韩国人眼里见到的上海是东西文化的‘混血都市’，它的文化就是‘鸡尾文化’，轻蔑同时憧憬的对象。尤其是上海是 1894 年金玉均被暗杀的地方，所以上海是让当时的韩国人引起哀愁的地方。对韩国人上海以很多名称脍炙人口，比如说上海是东方的伦敦和巴黎，在城市的规模方面说起来是个东方的大都会 (metropolis)，在酒吧，海港情调方面可以说是东方的马赛，因其阴郁的气氛，犯罪叫成东方的芝加哥等等。²

1920 年代初有一个韩国人写了一首诗，描写了在华丽雄壮的南京路和外滩里面的主客颠倒的上海的矛盾。

这儿是上海，东方的伦敦
这是什么意思？
出入大码头的船舶，
尾巴交错，梳齿砸着的
南京路的那么华丽的建筑物
和黄浦滩路边那么坚实的那些铁楼
听说是银行，或是公司。

² 洪陽明, <動亂의 都市 上海의 푸로필>, <<三千里>> 제 4 권 제 3 호, 1932. 3. 1.

啊！东方的第一贸易港，就在这儿（中略）
各个人种集在一起夸耀自己的力量
金力，腕力，下一个是武力
潮水般的生存竞争。
以弱肉强食时代的话仍然适用来
问，这块地的主人到底是谁呢？
啊！已老的主人恭敬地揖着
所有的一切，献给黄毛鬼。
大家要知道，这块地的主人到底是谁（后略）³

虽然有如此否定的视觉，但是包括中国和全世界革命家在一定的限制的范围内比较自由地活动。韩国抗日革命家也注目这一点而在上海法租界树立抗日根据地也不是异常的事。被压迫弱小民族的亡命客在帝国主义从中国强压地夺取的治外法权地‘租界’进行革命活动，这是历史的反讽。

韩国历史上最初引进民主共和制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诞生的法租界成了以后抗日革命运动的‘策源地’和‘摇篮’。因此今日访问上海的韩国人不管访问的目的都参观马当路所在的韩国临时政府旧址陈列馆默哀。当时来到法租界的抗日运动家从事职业的反日运动。对他们来讲租界内的石库门弄堂是为了秘密革命活动的最好的地方。来到上海的很多韩国人为了保障安全的活动却获得了中国国籍。所以日本每当逮捕韩国革命家的时候造成了中日之间的国籍争论。无论如何居住租界的外国人中韩国人最有明显的政治性。

1932年4月韩国人尹奉吉的虹口公园爆弹义举震动了上海。以中国人的眼里看这是实现了中国的愿望，以英美法，这些租界当局的眼里看韩国人是非常‘危险的存在’。因这件义举的余波，租界再也不是安全地带。在日帝大规模的逮捕的情况下，韩国革命家逃出抗日根据地，法租界。

³ 張獨山，〈上海雜感〉，〈〈開闢〉〉 제 32 호，1923. 2. 1.

居住上海的韩国人不都是抗日运动家或者韩奸。革命家离开上海以后还很多韩国人留在上海。他们的生活基盘在上海，所以他们不能离开上海。不管肯定否定反正他们在艰苦的情况下从事多样的职业生活下去。上海已经成了个他们的第二故乡。临时政府离开的法租界以后，日本领事馆发挥比以前更大的影响力。因为一直把法租界的抗日韩国人视为‘眼中钉’的日本总领事馆按照所谓徙民政策进行把留在法租界的韩国人移到共同租界，尤其是虹口地域。1937 年中日战争和日军的上海占领以后，居住上海的韩国人不管消极积极不得不都适应日帝的支配秩序或者协助日帝。尽管如此大多数韩国人在抗日和亲日的灰色地带边以被动的态度协力日帝边观望情况。

三

过去 150 年间，上海备受国际社会的关注。因此对于上海和日本，英国等外国侨民史，也早就有中外学者的研究。其研究成果也介绍到全世界。⁴可是对当时接着日本人，俄国人，人口规模名列第三的韩国侨民几乎没有谈到。这也许是跟因战前韩国是日本的殖民地，所以在上海外国人口统计上韩国人被分类在日本人或者无国籍人有关。

中韩研究者的对上海韩人侨民史的研究至今固然不是没有的。⁵可是把其研究成果加深和广告的事依然稀少。其原因在于韩国学界的研究方向侧重于抗日运动而且像上述的抗日，亲日的图式而硬直的认识。所以对抗日和亲日之间的那些人的

⁴ 熊月之、馬學強、晏可佳 選編，〈〈上海的外國人(1842~194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⁵ 孫安石，〈〈一九二〇年代，上海の朝鮮人コミュニティ研究〉〉、東京：東京大學 博士學位論文，1988；孫科志，〈〈日帝時代 上海 韓人社會 研究〉〉，首尔：高麗大學 博士學位論文，1998。

研究也留着空白的。因此 1949 年上海进入中国共产党控制以后，也不能离开上海的韩国人也被人们忘记了。

所以当务之事在复原这些被忘记的历史。为了达成这些课题，先要把现有的研究成果和新的资料综合起来，而且应该与国际城市上海有着密切地联系起来的系统而实证的研究。在这样的基础上还需要对当时跟居住韩国人一起生活的各国侨民史进行研究。尤其是要充分地参考有关日本侨民史的研究成果。幸亏最近对韩国侨民史，上海学界也开始予以一定的关注，这是非常鼓舞的事。

租界史研究的新视点

东华大学 陈祖恩

★ 今天上午，三位教授作了精彩的报告：

1、孙安石教授的报告是《上海的“北华捷报”与日本出兵山东问题的报道》，这是根据第一手材料，研究欧美人对这一国际敏感问题的关注。作为韩国出身，在日本取得博士学位并在日本任教的学者，从欧美人的角度关注日本出兵中国山东的问题，自有其独特的视点。

2、贵志俊彦教授曾主持《关于 17-20 世纪东亚地区“外国人”的法律地位综合研究》的研究课题。今天他发表的《利用“战前中国境内‘外国人’人口统计数据库”的地域人口分析——针对民国、满洲国时期的研究》，向我们展现了一个资料非常详尽的人口数据库网站，由此考察“外国人”人口变化背后的政治动机以及具体的社会活动。这是一篇学术价值很高的论文。

3、金光载教授的报告《上海的租界与韩国人》，具有历史的沉重感。在上海租界史的研究中，很少有人关注当时人口规模名列第三的韩国侨民。这可能与当时韩国是日本的殖民地，在上海外国人口统计上韩国人被分类在日本人或者无国籍人有关。但是，在上海的韩国人虽然不乏抗日的革命者，也有一部分确实是日本侵华势力的“协力者”。韩国侨民在上海具有受害者与加害者的双重身份，他们在上海的生活是苦涩的，回忆自然也不自然。金教授的论文揭开了这层迷雾，期待着上海韩侨的研究有更多的成果。

★ 随着 2010 年世博会的临近，上海形象与国际都市研究作为政府关注的问题正在进行。尽管在那些人文工程中都不说租界，但大家都明白，所谓国际都市的上海与租界有密切的关系，30 年代的上海国际都市形象，其主要特征大都在租界内，租界里留下的那些建筑，无声地在叙述着那段历史。因此，上述工程尽管名称不一，其实离不开租界史的视点。

例如，目前正在编纂的《上海与外国文化地图》就是是一套展现上海与外国文化渊源发展、相互交融关系的系列丛书。这套书共有八本，包括英国文化、美国文化、法国文化、俄国文化、日本文化、印度文化、犹太文化、韩国文化、其表达的视点即上海作为中国近代以来对外的窗口，它集聚了各国的侨民，吸纳了各国的文化，海纳百川，使这座城市在文化上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当年租界的司法、政务、警务、消防、教育、文化、医疗等设施逐步设立，历经一个多世纪的风雨沧桑，各类建筑不少还耸立在上海的街头，已成为这座城市重要的人文记忆与遗产。文化上的传承，使上海在中西文化交流上具有独特的地位。

其他还有许多诸如上海建筑散步等工程项目，但大致如此。

★ 随着租界史研究的深入，有关上海历史建筑的保护也成为人们的共识。日本媒体经常会以“日渐消失的日本建筑”为题进行宣传。其实，这里有一个误区。虽然在改革开放的前期，随着上海城市建设的发展，很多旧建筑被拆除，其中包括一些很有价值的历史建筑，也包括一些日本人曾经使用过的住宅。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日渐消失的日本建筑”，是与上海城市中日渐消失的旧建筑是相等的，不具有特别的政治含义。

事实上，上海的日本建筑大部分都保留着。

上海的日本代表性建筑 90% 以上都保留着，如日本领事馆、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横浜正金银行上海支行、三井物产、三菱商事、台湾银行、日清汽船会社、居留民团总部、福民医院、西本愿寺上海别院等，就连日本海军陆战队总部那样的建筑也保留着，拆除日本人俱乐部等少数建筑的真正原因是道路拓宽等。

上海的日本人学校有 16 所，被拆除的只有 3 所，其他都保留着。

上海日本纺织企业的工厂建筑虽然大部分被拆除，但其职员的高级住宅，70%左右保留着。

日本人高级居住区的山阴路已列入住宅保护区名单，马路也不会被改造拓宽。

当然，负责保护的人员素质不一，保护的方法也有差异。例如，有人将西本愿寺上海别院的外墙涂上油漆，这是一种常见的愚蠢保护法。

★ 有关租界史的研究，已有许多成果，今天向诸位介绍由东华大学人文学院与上海市档案馆联合主办的“近代城市发展与社会转型”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出现不少新观点、思维。

在“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方面，刘石吉(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研究员)的论文《传统中国城市与通商口岸：特征、转型及比较》，从宏观的角度考察了中国传统城市的功能以及 19 世纪中后期沿海口岸城市的特征、转型和意义。戴一峰(厦门大学嘉庚学院教授)的论文《近代厦门城市空间的重构与社会变迁》，以厦门城市发展为个案，提出一座城市的区位，往往预设了该城市空间结构的基本框架，以及城市空间的规模和演化路径，因而城市区位对于城市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城市管理与城市文化”方面，熊月之(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的论文《宴会·赛会·舞会：晚清上海华洋关系的另一面》，通过对宴会、赛会、舞会的详细考察，呈现上海社会转型初期官民涉外态度和有关意识、观念。有关城市管理的论文，比较集中于上海与天津两座城市。宋美云(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的论文《契约与习惯——近代天津会馆房地契约与诉讼习惯研究》，从天津近代商人房地产契约以及官方成文法与民间诉讼习惯入手，探究这一体系内部的协调和官方成文法与民间习惯之间的协调关系。马自毅(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的论文《从告示看开埠初期上海市政管理与变迁——1860 年代上海官府“告示”研究》，以《上海新报》为主要资料来源，抽样分析了上海开埠初期，省、府、县各级官员发布的告示和相关事件的告白，探讨其背后所反映的时代与社会。邹振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的论文《西餐引入与近代上海城市文化空间的开拓》，详细探讨了西方餐饮和餐饮文化的传人与影响，论述了中西餐饮交融的最初过程。

在“工商金融及城市比较”方面，陆兴龙(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的论文《近代上海苏州河沿岸工业考察》，以上海苏州河沿岸为上海工业发祥地为前提，详细梳理了这一地区行业结构和重要工厂企业、著名企业家和有重要历史价值的建筑。戴建兵(河北师范大学教授)的论文《甲午战争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程度的加深——以外商银行为中心》，以宏观经济研究为视角，论述了外商银行对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朱荫贵(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的论文《抗战前后的上海华商证券市场(1927~1945)》，论述了上海抗战前后华商证券市场的发展变化。该文以大量统计数据作定量分析，持之有故，言之有理，显示出微观经济学研究的规范性。李一翔(东华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的论文《金融扩散中的区位差异——以近代上海、汉口、重庆三地华资银行业发展为例》，以上海、汉口、重庆三地华资银行的发展为例，讨论金融扩散中的区位差异问题，论证了在上海华资银行持续扩散之下，汉口、重庆的华资银行有着不同的扩散能力，从而得出不同城市在金融扩散中显出区位差异，对当地的经济形成不同影响的结论。李培德(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副教授)的论文《论 1920 至 1930 年代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舞弊问题》，以 20 世纪二三十年年代发生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舞弊案为例，论述了其时上海银行普遍存在的舞弊问题。

在“社会群体暨重要人物、重大事件”方面，马陵合(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的论文《城市特殊群体社会救助制度的历史考察——以上海人力车夫互助会为例的研究》，以上海人力车夫救助会为个案，探讨了社会救助的特质，考察了这一组织的结构、属性、管理、操

作等内容。马长林(上海市档案馆研究员)的论文《19世纪末上海两次小车夫抗捐事件历史考察》，侧重于小车夫的社会意识。邵雍(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的论文《晚清上海乞丐初探》，主要依据上海地方文献而作，不仅论述了晚清上海乞丐的生存状况，也考察了市政当局对这一群体的处置和管理。忻平(上海大学教授)的论文《1930年代上海工人生活水平与状况的一个调查及分析》，对305户工人家庭生活收支结构、消费模式及其与社会经济环境的关系进行了综合分析。作者认为，尽管上海工人家庭消费模式展现出一种现代性趋向，但仍然处于一种新旧杂陈的状态。

★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罗苏文研究员的《上海传奇》，是上海研究的经典著作。马长林主编的《老上海行名辞典》(1880-1941，英汉对照)，以档案馆藏40余册《行名录》为依据摘录、整合，计14000条老上海工商等机构的条目，是租界研究的必备书。

近年来，与上海租界研究相关的著作还有：

熊月之 周武主编：《上海——一座现代化都市的编年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1月。

徐牲民著：《上海市民社会史论》，文汇出版社，2007年1月。

陈文平 蔡继福编注：《上海电影100年》，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年3月。

上海市档案馆编：《日军占领时期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6月。

王垂芳主编：《上海1843-1956，洋商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7月。

吴健熙 田一平编：《上海生活：1937-1941》老上海期刊经典，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7月。

邢建榕著：《老上海珍档秘闻》，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7月。

潘君祥 段炼著：《话说沪商》，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7年7月。

许步曾著：《寻访犹太人：犹太文化精英在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05月。

洪煜：《近代上海小报与市民文化研究(1897-1937)》，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08月。

王儒年著《欲望的想像——1920-1930年代《申报》广告的文化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3月。

陈祖恩著：《寻访东洋人：近代上海的日本居留民(1868-1945)》，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1月

陈祖恩著：《上海日侨社会生活史》，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1月。

唐方著：《都市建筑控制——近代上海公共租界建筑法规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

王健著：《上海犹太人社会生活史》，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9月。

汪之成著：《近代上海俄国侨民生活》，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

陈同著：《近代社会变迁中的上海律师》，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

张鹏著：《都市形态的历史根基：上海公共租界市政发展与都市变迁研究》，同济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

晚清租界欧美建筑文化遗产初探

——以上海、天津两城市为例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罗苏文

提要

租界是晚清条约口岸辟设的外侨自治行政辖区,也是近代中国大陆城市化推进的先行地,欧美建筑文化输入的主要窗口。晚清欧美建筑文化输入的文化条件是什么?创造出什么样的人文环境,对推进中西文化接触有何影响?

一、一地两制:租界近代市政工程的启动

开埠前津沪两地扮演内贸港兼地方行政官署驻地的角色,制约了海运资源利用城市功能拓展。主要表现:两地均属位于河海交汇地的内贸港,被排除在对外通商正口之列。港区、商业街僻居城外,设施简陋,难以拓展。城市功能以行政职能为主体,建筑功能单一、市政设施简陋。

晚清依据中外条约,两地的租界区成为中外自由贸易港,事实上一地两制行政区。

借鉴香港方式(自治市,近代港区、市政工程),成本较低:外侨在香港选择的商业区是滨海荒僻滩地,临近深水港湾、地价低廉,并未太多打扰华人民居的镇区生活。实施永久租期。辖区实行华洋杂居合作,推进法治管理。推进法治管理。香港在1842年2月已形成15000人的居民区,其中华人居民在12000人以上。1842年3月《中国之友》称“在殖民地历史上,香港的发展速度前所未有,成为一个自由而价廉的庇护地,为个人和财产提供了充分保障”。¹1843年6月香港正式称维多利亚城,英国政府颁布《香港宪章》,香港成为直辖殖民地,最高权威是法律而非个人。香港总督包令(1854年4月-1859年5月)试图引进涵盖华人民居的代议制未果,后改行推进招募和培养殖民官员的计划。1864年后香港建立公立教育制,²中英文双语教育成为引导香港华人融入世界舞台的第一步。

津沪两地华人房地产市场:晚清上海江南战乱刺激富有华人移居租界,形成华人中挡住房市场。民初北京下野政要纷纷寓居天津租界,刺激高档小洋楼走俏。1915年津海关报告称,华人洋房供不应求,以意租界最多,“富豪华人又多视租界为安乐土”。³20世纪初天津早期的里弄民居也始于租界区,截止1949年已成为天津建造数量最大的住宅类型。1930年代的小洋楼住宅多在英租界新区的五大道地区,及意租界的马可·波罗广场周围。房主是华人多,洋人少。⁴晚清两地租界的西式建筑是依据市政规划,对街区成片地块开发,建成消费档次分级的住宅区。

¹亨利·璞鼎查(Sir Henry Pottinger)作为外侨区的行政官,集全权公使、总督、商务监督于一身。[英]弗兰克·韦尔什(Frank Welsh)著、王皖强等译《香港史》第165页。

²1856年7月英国殖民大臣拉布谢尔在第29号公函中阐释限制香港代议制的主张:由于香港的华人居民尚缺乏最基本的道德准则,侨民多为临时居民,“倘若纯粹是出于选拔才干出众者的目的……我认为,要甄选管理这个政府的官员,考试……与公开选举一样有效”。该计划后倚重伦敦大学英王学院新设的中文系,并从爱尔兰各大学征求应试者。1862年香港首次举行竞争性考试选拔“官学生”,配备职业化官员。《香港史》第251、252-253、257、268页。

³吴弘明编译《津海关贸易年报(1865-1946)》,第329、337页。

⁴五大道即今马场道、睦南道、大理道、常德道、重庆道等五条马路,为天津小洋楼的集中区域。高仲林主编《天津近代建筑》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年版,第41、36页。

形成建筑设计规范,市政设施齐全、生活便利的街区。欧美建筑的落户,是近代外来文化强势进入,形成融合中西的文化区(culture area)欧美建筑景观则是该区文化识别特征之一。租界与华界的建筑景观既有融合,又差异悬殊。

二、融合中西建筑的成功尝试

建筑不同于绘画作品,人们不可以随意摘取,优秀的城市建筑兼有实用、审美功能,是艺术珍品;而拙劣的建筑作品被视为是城市“肿瘤”。晚清上海、天津租界华洋杂居的生活环境,呈现出具有时代烙印的中西式建筑景观,促进中西建筑文化借鉴、融合、创新。这一进程主要有三点启示。

促进中西建筑文化借鉴、融合、创新,多元共存。早期上海外滩的洋房“各座房子的构造,差不多是一个式样。19世纪后期,英国建筑师在上海建筑行业拥有优势地位,清一色的红砖或灰砖清水墙,镀锌铁皮屋顶,被英侨讥讽为“上海式文艺复兴风格”,当时上海被认为是一座仓促建起来的城市。建筑师因文化背景(民族、宗教、个人风格)不同。没有权威独占。

1890-1910年代参与外滩建筑设计者:

①[英]玛礼逊洋行(Morrison, Gratton & Scott., 1885),

毛礼逊(Gabriel James Morrison)是英国工程师,他曾是上海淞沪铁路的总工程师,1885年他与建筑师格兰顿(F. M. Grantton),是上海仅有的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成员之一,合作开设这是上海最早具有较大规模的建筑设计机构。

中国通商银行(1897, p29); 汇中饭店(1906, p74, 华建)、2幢

提示:玛礼孙 Gratton Morrison (& Scott) 1 Hongkong Rd.(1880); Kiukiang Rd.(1884); 1 Foochow Rd.(1884-1888); 16-17 The Bund (1891-1901); 27 Kiangse Rd.(1902)[299]

玛礼逊(Christie & Johnson) 3C Peking Rd.(1913) [103]

玛逊行(Marsen Trad'g Co.) 389-391 Av.Foch(1933-1934) [280]

②[英]公和洋行(Palmer & Turner Architects and surveyors)。1900年代-

威尔逊(George Leopold Wilson)主持的设计外滩建筑:汇中饭店东入口(1906, p74, 华建, 砖混)、有利银行(1916-1918, p36, 华建, 最早钢框之一)、扬子大楼(1918-1920, p35?), 3幢

提示:公和洋行(Gilmour & Co., D) 31 Nanking & Kiangse Rd.(1880-1881); 9A、10、14 Hankow Rd.(1884-1894); 24 Kiangse Rd.(1881-1906)[177]

公和(Gabbott, Begg & Co., Ltd./ Gabbott & Co., F.R.) 7 Kiangse Rd. (1922-1923); 53 Szechuen Rd.(1924-1930); 3、70 Rte.Laguette(1931-1941)[171]

公和/新公和(E.W. Turner) c/o Shanghai Club (1905); 29 Kiangse Rd.(1906); 12 Quai du Yang King Pang.(1908); 1 Yuen Ming Yuen Rd.(1909-1922); Clen Bldg(格陵邮船-怡泰).1Peking Rd.(1923-1928)[461-462]

公和(Palmer & Turner Property Office) 17 Canton Rd.(1932-1941)[336]

③[英]通和洋行(Atlinson & Dallas, Civil Engineers and Architects.), 4幢

大北电报大楼(1906-1907, p2 砖混), 东方汇理银行(1910-1911, p31, 玻璃拱顶),

④[英]马海(洋行) Moorhead, Halse & (Robinson) 13、17 Yuen Ming Yuen Rd.(1908-1928 [298]上海总会(1909-1910, p83, 沪最早钢混), 亚细亚大楼(1913-1916, p6,

钢混), Spence, Robinson & Partners 3、27、39 Peking Rd.(4th Floor) (1929-1941) [424];

⑤其他外滩建筑设计者:

倍高洋行(German architects Becker & Baedeker): 华俄道胜银行(1901-1905, p30, 项茂记洋行建, 混合结构, 最早釉面贴砖)

新瑞和洋行(Davis & Thomas, Civil Engineers & Architects.): 礼查饭店(1910 重建, p73, 钢混、砖木并用)

1918-1930 年代上海有外籍建筑师设计机构二十余家。近代天津的外籍建筑师事务所也 有多家, 汇集了英、法、瑞士、奥地利、意大利、日本等国建筑师。1920-40 年代活跃在 上海、天津建筑界的华人建筑师大多有留学背景, 1919 年前后始创于天津的基泰工程公司由 留美归来的建筑师关颂声组建,“建树于津沪颇多”, 并在全国各重要城市设有事务分所。华 人建筑师在 1924-41 年间为上海增添的现代楼宇不下 30 幢。

二, 在建材、装饰设计上注重引进欧美最新技术、建材, 拓展建筑物的实用性、观赏性。上 海租界采用钢结构的多层建筑。中国菜场(1898 年)是上海第一幢全钢结构的二层楼建筑。 惠罗公司(1906 年)是上海第一座钢筋混凝土结构楼, 安利洋行新楼(1907 年)由美国底 特律钢筋混凝土建筑公司担任工程指导并施工, 以贯穿楼层的钢筋、混凝土楼梯、天花板、 楼板取代横梁, 使楼体因钢筋混凝土框架的内在连接而更加坚固, 并缩短工期。

三、华洋共享: 租界公共娱乐区

晚清两地租界也是提供多档次消费选择的公共娱乐区, 华洋共享的社会空间,⁵凯文·林 奇认为, 分析城市视觉品质, 主要着眼城市景观表面的清晰或可读性, 组成完整的形态。⁶

①最具有观赏性的建筑景观以外滩、中街为例。外滩建筑轮廓线也是上海都市的天际线, 外滩形象的塑造始于 1869 年,

②1910 年代: 确定英式风格主体地位, 占地规模、高度、建材砖木向钢混过渡。

公和 3、马礼逊、通和、马海各 2, 倍高、新瑞各 1、共 11 处。英 4, 其他 2

③上海时尚都市的形象代表。

主要定型于 1920 年代, 当时外滩主要建筑的设计大都出自自由建筑师威尔逊(George Leopold Wilson)主持的公和洋行⁷设计 7 幢, 过半: 汇丰银行(1921-1923, p38, 英建)、 怡泰大楼(1922,p13, 钢混)、麦加利银行(1922, p40, 柯尔公司建, 钢混)、横滨正金银行 (1923-1924, p41, 柯尔公司建, 钢混)、江海关(1925-1927, p21 华建心仁记, 钢框架)、 沙逊大厦(1926-1929, p76, 华建心仁记, 钢框架)、中国银行(中英合作, 1936-1937, p53, 陶桂记, 钢混框架)、。

建筑风格、材料都较为接近, 构成是一个紧凑和谐的建筑群, 由渡轮码头、江畔绿地、 人物铜像雕塑、马路、高楼等构成一个简洁明朗、舒展开阔的都市景观区。

其他设计者作品 7 幢:

[英]思九生洋行(Stewardson & Spence): 怡和大楼(1920-1926, p12, 华裕昌泰, 钢混 框架)

德和洋行(Lester, H. & Co.): 日清大楼(1921-1925, p19, 钢混); 字林大楼(1924, p18

⁵social space, 指社会群体感知和利用的空间。[英]R.J.Johnston 主编、柴彦威等译《人文地理学词典》第 660 页。

⁶凯文·林奇著, 方益萍等译《城市意象》(The Image of City), 华夏出版社 2001 年版, 第 2 页。

⁷它是香港一家老牌建筑设计机构, 1912 年总部由香港迁入上海。汇丰银行建成后, 被英国人认为“从苏伊士运河到远东白令海峡最华贵的建筑”。王垂芳主编《洋商史—上海: 1843-1956》第 209 页。

茂生洋行建，钢混）；台湾银行（1926，p45，钢混）；

弗雷泽 Freizer，百老汇大厦（1930-1934，p151），建造英商公司，钢框架

法邮大楼（1936，p26）中法实业公司（Minutti & Co.Architects），钢混，现代风格

交通银行（1947，p54）鸿达洋行（C.H.Gonda）陶桂记建，装饰艺术派

著名洋行在其他马路的作品：单幢难以形成视觉冲击

通和：纱交所（延安东路，1923，p68，钢混）；中南大楼（汉口路，1917-1921，p36，钢混）

德和：三菱银行（九江路，1934，p49，钢混）

公和：三井银行（九江路，1934，p49，钢混）

摩天楼（skyscraper），是技术与社会多种因素结合的产物。它是采用钢梁结构承重的多层建筑，安装电梯，经济、便利，有效提高对城市土地的利用，成为百货公司、商务楼的理想场所。上海国际饭店。天津从晚清的戈登堂，到1920年代模仿汇丰银行“古典风格”的开滦矿务局总部大楼。

美国著名华人建筑师贝聿铭(I.M.Pei)幼年时代在上海生活，他晚年认为对外滩的建筑群和美丽的河滨大道“那种强烈的印象是难以忘怀的”。外滩街区的定位理念、建筑布局及风格塑造是成功植入一个欧式滨江城市休闲区的样板，兰格认为建筑是“一切被创造的、可见的环境”。林奇认为环境可以围绕一系列焦点组织起来，其元素如道路、标志物、边界、节点、区域等，组成一种可意象性环境。外滩、中街的沿街建筑群宏伟和谐，构成特征鲜明的整体想象，不易混淆。租界区的高层建筑也曾极大激发华人青年的创造冲动。

清末天津英租界中街“路面平坦，两旁有双排的榆树，也由于一些外观美丽的大洋房的出现，因而租界出现了固定而明显的结构”，英国球房也设在中街，是英商议事集会之所，内部设备齐全（有网球场、台球、餐厅、浴室）。另7家外国银行，是天津近代金融区的核心，“天津华尔街”（Wall Street in New York），1919年19岁的许姬传初访天津租界，感觉既惊讶又兴奋。“我们走到英中街（1919年19岁的许姬传初访天津租界，感觉既惊讶又兴奋。“我们走到英中街（指英租界的中街），仿佛到了另一个世界，马路上几乎看不到一个烟蒂，人行道上多半是西方男女，很少看到中国行人，陪着这古老建筑洋楼，觉得空气清新，环境幽静。同行的女友说‘天津就这块地方最高尚’”。

晚清，上海、天津两地的交通距离缩短。华洋交往存在某种社会距离（social distance）⁸，但上述租界公共娱乐场所有助于增进相互间的交流、了解。

⁸指两个或多个社会群体由于相互有分离意愿或相互歧视所造成的分离。社会距离通常指群体之间的相互交往频度来度量，两个群体之间的社会距离通常是与他们在同一城市中的空间距离相关。同上，第652页。

◆绪论

本研究以1910年初(明治末期)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终战)在中国和朝鲜经营的日本纺织工厂社宅地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在城市空间形成过程中的演变过程。

此次发表以上海、青岛、首尔、光州等地新建的“钟渊纺织工厂”社宅群为对象,利用当时的图纸以及现存建筑、现状图、新旧地图、画册、旧照片、航拍照片、卫星照片及相关人员的陈述等资料,在规划布置、福利设施、社宅等方面进行分析;并且调查当时的居住环境,如租借和殖民地工厂劳动者的生活空间状况,中国员工和日本员工居住环境差异,企业家和建筑家拥有怎样的乌托邦计划,当时的住宅地如今变成什么样子等;同时研究租借和殖民地内人们的生活状况。

◆钟渊纺织的进入(中国/朝鲜)

1911年(明治44年)钟纺合并绢丝纺织株式会社,并继承所属的苏州河沿岸上海造绢丝株式会社绢丝工厂(即以后的“公大第三厂”),这是它迈进大陆的第一步。钟纺正式进入中国是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青岛被攻陷之后,1920年(大正9年)在上海市郊外平凉路一带,接近黄浦江的区域划分9万9千余坪的土地,建立公大纱厂(1922年以后改为“公大第一厂”)进行生产。1925年收购上海杨树浦路黄浦江沿岸英国人所经营的老公茂纺厂,建立“公大第二厂”。1939年(昭和14年),从前面所述的公大第三厂独立出“公大第四厂”。如今,第一、二厂已停止生产;第四厂废止已久,在原地建立了高层住宅。

青岛比上海晚1年建立工厂,1921年(大正10年)在青岛市郊区的工业地带——沧口地区划出25万坪的工厂用地,并在1923年开始生产。当时称该工厂为“钟渊纱厂”,后改名为“公大第五厂”。1945年(昭和2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同年该工厂改名为“中国纺织建设公司青岛第六厂”,至今仍旧继续生产。

在天津设立工厂则更晚。1936年(昭和11年)收购中国人经营的“天津祐元纺织公司”和河北地区的“天津华新纺织公司”,并改名为“公大第六厂”和“公大第七厂”,同年进入生产。如今,第六工厂已经破败不堪,开始建设水上综合文化设施项目;而河北第七工厂则以修理纺织机械为主继续生产。

综上,钟纺在中国共有7个工厂:上海有第一、二、三、四工厂;青岛有第五工厂;天津有第六、七工厂。其中上海第一工厂和青岛的第五工厂是购买使用地后新建的工厂,而其他五个工厂是以收购的方式建厂并投入使用。

1920年以后,钟纺在上海、青岛、天津等地的日系纺织企业中成为佼佼者,其员工达一万人。

钟纺进入韩国是在1931年,以九·一八事变为契机,在朝鲜半岛的产业诱惑下开设工厂。当时在宇垣总督的建议下,钟纺的津田信吾社长于1935年在光州地区购买10万坪用地,建立拥有2100名员工的全南工厂。次年,在京城(现首尔)购买10万坪用地,建立永登浦工厂,拥有员工3000名左右。1939年在平壤17万坪的用地建立人绢工厂,并开始营业。

◆钟纺社宅群

钟纺的经营者武藤山治(1867~1934)从美国回国后,1894年加入社钟纺。并与留美回国的建筑家平野勇造合作,1896年(明治29年)以家庭主义为理念建立劳使一体型(劳动者和居住使用者一体型)且具备福利设施的兵库工厂。津

田信吾继承武藤山治后提倡“利益3分法”，即国家、当地人和企业各占3分之一的方针。那么钟纺进入中国和朝鲜后，工厂的居住环境是如何计划的呢？1926年景村薰雄的著书里记载：“公大第一工厂内为中国工人设置了社宅、医疗卫生、教育、娱乐、庙宇等设施。因此，工厂内职工不需要出门，在院内就可以解决大部分需要。”；1929年，A. Pearse 视察中国纺织业，在公大工厂报告中对住宅群和福利设施给予评价：“工厂在职工的文化设施配置上取得了成功，即该工厂建设了中国人村，而且具备了医院、浴场、俱乐部、商店、学校、庭院、运动场、食堂等设施，总之日本内地所拥有的福利设施全都照搬到这里。”

本文以中国的上海第一厂、青岛第五厂和韩国的光州全南工厂、京城永登浦工厂四个地区的社宅群为对象，进行实地调查，报告其概况。

△上海第一厂社宅

由于当时的建设图纸已无从查证，只能根据当时的航拍照片和现在的卫星照片，将如今的建筑物配置图为基础进行了实地调查。用地位于租界最东端的郊区，邻接运河，面积约9万9千余坪，北部近一半以上为厂区面积。如今已关闭的工厂内存有两栋建筑，分别为办公建筑和单身宿舍。分析当时的厂区照片，用地中央布满了绿化，现如今变成住宅区，盖了7栋6—7层多层住宅。西侧留有私营棉业公司的空地。用地的南半部分存留很多旧住宅，东南区域现存带有庭院的独立式住宅和旧日本人社员居住的长屋式住宅共18栋，住宅为二层砖混结构，外形以带有阳台和平台的殖民地风格的住宅居多；宅地中央有一大道贯穿南北以做分隔，其西南区域设置中国工人住宅区，住宅样式为2层砖混结构的广东式里弄住宅，布局方式采用并列式，每行布置14栋，住宅密度较高，现存的住宅共28栋。

根据战前照片南面尽端植满树木，没有任何建筑，而如今其东侧建造3~6层的多层建筑和17层的高层住宅建筑，西南角改建一座小学。

在一个标题为“No.1 Cotton Mill, Kung Dah”的资料中藏有关于第一公大工厂的重要的资料，即介绍战前第一公大工厂的27枚贺卡。其中在关于社宅和福利设施的卡片中可以了解，厂内有网球场、中国人职工房、职工房、医院、花园、花园内的稻荷神社、游园地、中国人食堂、小学校及补习学校、俱乐部「其日园」、花园内「其日亭」及水池、中国人住宅内景、中国人礼拜堂等设施。在此次调研中除了社宅和中央道路以外，其它福利设施均未发现。

△青岛第五厂社宅

青岛第五厂位于沧口大马路和胶州湾所夹地带，用地面积达25万坪。根据1940年制成的总平面配置图，沿胶济线东侧设置工厂；中部设日本人住宅；中间隔着中央大道其西侧为中国人住宅区，南部为南山公园，而且远离工厂用地在公园南部设立另一个中国人住宅区-南山社宅。正门设在大马路的西北侧。参照更详细的建筑物布局图分析其福利设施的配置，具体布局如下：日本人社宅地内有游园地，游园地的一角设有神社和寺庙、储水池、网球场、俱乐部、茶室、浴场、商店、理发所、图书馆等设施；中国人社宅区设有茶馆、浴场、厕所；在工厂和社宅之间建立医院、病房、宿舍、食堂、合宿所、女子合宿所、温室等设施，围墙外设有公园和球场。

日人住宅按规模分为A、B、C、D四种类型，数量合计为56栋219户。住宅形式分为独立式和二层长屋式两种类型。外形通常采用殖民地风格，设有阳台和平台；内部空间则采用榻榻米和风样式。中国人社宅与上海的里弄住宅有所不同，采用了少有的分栋平屋型，数量为88栋共732户。附近还设有南山中国人社宅

计 14 栋，具体户数不明。

综上，日式、中式两种住宅，其总和达到 158 栋、951 户左右，属规模较大的集团住宅地。如今，整个住宅地 70%住宅仍旧存在，住户继续使用内部各种设施。

△光州·全南工厂社宅

1935 年，全南工厂在光州市林洞的 7 万坪用地上开业，员工达 2100 名。虽然没有建设时的图纸，但根据当时的鸟瞰照片和现在的卫星照片可以了解整体概况。用地形状为菱形，中央布置工厂，其东侧为大规模社宅群，南面与工厂隔着一块空地的位置设置小规模社宅群。位于东南侧的正门并没有改变，本部办公建筑同样维持原来的样子。此外用地的西北外围设置便于市民利用的运动场和娱乐设施。

在“6.25 战争”中全南工厂的大部分设施被烧毁，1953 年新建全南纺织株式会社。之后，1961 年工厂分为全南纺织株式会社和日新纺织株式会社两部分，如今这两个会社仍旧继续生产、营业。

分析两个会社的福利设施，如下：全南纺织株式会社内部设有可容纳 700 名的食堂（525 坪）、医院（155 坪、2 层建筑）、浴场（男·女）、理发所、商店、娱乐室、运动设施（网球、排球、篮球、台球）等，同时社宅设施包括可容纳 1473 名员工的 3 层宿舍建筑（1877 坪、138 室）、男子独身宿舍 1 栋（53 坪）；日新纺织株式会社内部设有幼儿园 1 栋（32 坪）、公民学校 2 栋（201 坪）、附属医院一个（255 坪）、理发馆一个、运动设施（网球、篮球、台球、排球）等福利设施，住宅设施包括宿舍 5 栋（1204 坪）和社宅（1443 坪、62 户）。（资料：《光州市史》pp449~450）

此外，从照片里还可以确定，钟渊设有供市民使用的一块用地（面积不详），内设有运动场和 3 个游泳场。

根据调查，经过火灾后现存建筑只有工厂、办公栋和合宿栋的一部分，后来用地内新建了一些建筑，如幼儿园、医院等，详细的研究将在今后的课题中进行。

△京城·永登浦工厂社宅

永登浦工厂位于汉江郊外永登浦站前的工业地带的中心位置，用地约 8 万坪，1936 年 11 月竣工并开始投入生产。职工人数为男子员工 270 名、女子员工 1870 名。（资料：《朝鲜と建築》1935 年 4 月号 p48）。工厂建设同期，具有东洋第一称号的女工宿舍得以竣工。该宿舍正面屋顶设有朝鲜式楼阁，这是津田信吾社长为了使劳动女工充分感受朝鲜情绪而要求设置的，成为永登浦街上一道亮景（《京城日报》1936 年 10 月 30 日）。在《朝鲜と建築》1937 年 1 月号卷头载有钟渊纺织株式会社京城工厂事务所全景、工厂贵宾室、公寓全景、女工宿舍等。根据照片，公寓和宿舍楼均为 3 层，是钢筋混凝土的现代式外观。根据当时生活在这里的住户 A 氏所言，该公寓采用水洗式厕所，厨房设有垃圾箱，取暖采用暖气式，建筑地下设有通道，不需通过室外直接可以达到浴场。用地的一角设有田园，可以种植西红柿等蔬菜。此外场内还有与他本人小时候所拍的屋顶照片相同的木造平屋顶式幼儿园，总平面不明。

战后京城纺织株式会社继承该工厂，1970 年改名为京纺，并延用至今。

2006 年京纺作为业主，在破败不堪的永登浦工厂用地内进行大规模开发，建造了宾馆、商业设施、文化设施等一体化的高层综合设施。

➤ 结论

钟渊公大始建于 1920 年前半期, 它将武藤山路的家庭主义理念输入租界, 并且把工厂和附属设施共存的兵库工厂村模式导入中国地区, 在上海杨树浦工厂区外和青岛郊外新兴工业地区建设相同模式的工厂。津田信吾继承武藤山路后, 1930 年代进入朝鲜半岛, 在首尔、光州等地也建设同样的近代工厂设施群。

这些建立在中国和朝鲜地区的 4 个钟纺工厂社宅及福利设施, 从城市空间史的角度分析, 如下:

*从日本走出海外的这些纺织会社, 于 1920 年代在海外进行高质量的团地规划建设, 其中包括工厂、社宅群、福利设施、运动设施等, 这些项目和建筑物与日本内地比较, 超过内地水准, 拥有高标准的住宅环境。

*中国租界的中心地区在欧美资本的扶持下商业设施建设繁荣的同时, 郊外则借助日本资本, 在集团住宅地手法基础上建设高质量的工厂村。

*虽然中国人、朝鲜人社宅和日本人社宅规划在同一用地内, 但利用道路和墙体等构造物进行分割, 并且形成各自独立的配套福利设施, 住宅样式也有所区别。

*中国的社宅建设采用类型规划的手法, 即事前准备几种规模不同的规格住宅方案, 在其中选择住宅类型进行规划。规格住宅一般多为带有庭院的低层集合形式, 外形采用带有阳台和平台的殖民地风格, 内部一般是和洋折衷式生活空间。朝鲜部分尚未进行研究。

今后的研究课题是, 对平野勇造以后的相关建筑师、各住宅的原型及变化过程进行研究, 通过比较中、韩、日三个地区, 与各国学者共同将此课题进行深化。

参考文献

1. 「鐘紡 100 年史」鐘紡株式会社 1988 年発行
2. 「近代支那住宅散見」佐藤武夫、武基雄、建築学会集論文第 29 号、1942 年（昭和 17 年）11 月。
3. 「在華紡の福利施設—内外綿上海工場の事例を手がかりとして—」、芦沢知絵、中国研究論叢, 第 7 号, 2007 年 8 月。
4. 「戦前における日本紡績企業の海外活動—鐘淵紡績会社の事例を中心として—」桑原哲也 六甲台論集 第 22 巻 1 号, 1975 年 4 月。
5. 「鐘ヶ淵紡績・兵庫工場の福利厚生に関する一考察」藤谷陽悦他、建築学会学術講演梗概集 2,000 年。
6. 大阪朝日新聞富士倉庫資料「上海 F012-18 政治」公大 POST CARD 28 枚 COPY 公大紗廠(鐘紡支店)。
7. 「光州府史」光州市史編纂委員会, 1985 年 8 月。
8. 「光州建築 100 年史」全南大学出版部, 2006 年 3 月。
9. 「朝鮮と建築—鐘紡永登浦工場記事・写真」, 朝鮮建築会, 1935~1936 年

仁川日本与清国租界地

韩东洙
汉阳大建筑系教授
dsharn@hanyang.ac.kr

1. 租界制度和仁川租界地

19世纪中半期，朝鲜、清朝、日本三国从闭关锁国逐渐开放，而在这个发展过程中，长久惯用的经济制度也被废止，三国之间签订条约，设定开港场，规定允许条约相对国人在开港场居住和经商，当时被认证是治外法权。即在锁国的政策下，将不允许外国人居住和经商的政策，改为提供一种可以租借给外国人居住使用的特殊地块。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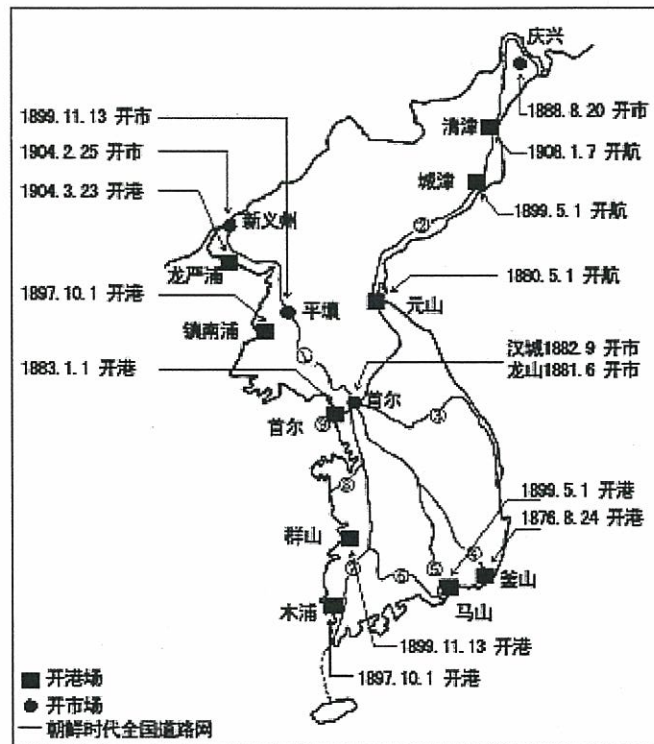


图1 开港场和开市场分布 (《首尔龙山地区都市化过程研究》汉阳大硕士论文, 2005年, 15页)

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将中国的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5个沿海城市开放。这些海港城市开放以后,为了解决外国人居住地的问题,英国领事与上海地方官签订了《欧美人的

¹ 孙桢睦, 韩国开港期关于都市变迁的研究, 一志社 (首尔), 1982年, 3页

居留地区特定》条约，这也成为租界地正式启用的标志²。

日本1854年与美国签订了《美日和亲条约》，分别与美国、英国、法国等5个欧洲国家缔结了通商条约，东京、广岛、长崎、横滨等五个地区被设租界地。

朝鲜的租界地是从1876年釜山港的开放开始的，之后1880年元山开港、1883年仁川租界地形成了。1897年木浦、镇南浦，1899年群山、城津、马山也分别开设了租界地。

仁川的租界地于1883年设立，同时与日本缔结了《仁川口日本租界约书》，所以日本的租界地首先被划定了。日本租界地面对济物浦，位于鹰凤山（现自由公园）的南部，大约10,375坪³区域。在条约签订时，朝鲜政府本来还想划定更大的地块给日本，而日本以管理不便为由拒绝了⁴。但是条约签订了还不到一年，日本人不断进入，达到了租界地容纳不下的程度，所以当时的租界地急需扩张。1898年，开始实行添海工程，第二年，就扩张了4000坪的面积⁵。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日本人继续大量流入，而日本租界地容纳不下的人则分散到了各国租界地和韩国人的居住区⁶。

在日本取得租界资格后，清朝于1884年在支那町（现在善隣洞）附近的丘陵地带设定了大约8,300坪⁷的租界地。通过清朝租界地的设立，朝鲜与清朝间的交往日趋频繁，与清朝间的贸易活动也活跃起来。很多大商人进入了朝鲜，有名的中国料理店也在仁川开店了，清租界地的商业发展异常繁昌。所以，清朝租界地开设没多久就需要扩大面积了，很多清国人逐渐在朝鲜人居住的三里寨地区，也就是现在的贯通新浦洞的开港路的路边区域，开设小卖杂货店，后逐渐扩张成清人居住区⁸。中日甲午海战中国战败后，很多华商暂时从租界地迁出了，战后不久中断的贸易活动又恢复了活气⁹。

1884年，朝鲜和美国，英国，德国，中国，日本等五国缔结了条约，从此各国租界地形成，其中日本和清国已是有特权的租界地，而其他几个国家则是与朝鲜签订过修好通商条约的国家。各国租界地位于清国租界地后面的山地，这一区域大约14万坪，供多个国家一起使用。¹⁰

² 开港场是一个国家设定的开始允许外国人居住和通商的区域，后来也叫做租界地，但是意思是差不多的。但是，上海作为英国在清朝的第一个租界地，开始是清人和英国人的开港场混在一起，由于不便于英国人管理，清人也视英国人为洋夷而加以排斥，所以两方都希望加以隔离。安旼秀，《关于仁川租界地的土地所有和土地利用的研究》韩国教员大学硕士论文，2003年，12页

³ 现在研究的著书和论文中所载的日本租界地的面积虽然是7000坪，但1914年制作的土地调查簿里，总面积是10,375坪。

⁴ 孙桢睦，韩国开港期关于都市变迁的研究，一志社（首尔），1982年，135页

⁵ 安旼秀《关于仁川租界地的土地所有和土地利用的研究》韩国教员大学硕士论文，2003年，13页

⁶ 孙桢睦，韩国开港期关于都市变迁的研究，一志社（首尔），1982年，145页。1894年，各国租界地基本只剩下领事和通译员，人数剧减，只剩下60-70名左右。而随着人口的急速增加，日本人除了在人口密度高的日本租界地经商，也开始在各国租界地里开店。1891年统计，在各国租界地中的日本人人数已经超过了日本租界地中的日本人数。据1893年4月末的统计，日本人的户数为1236户，人口为5619名。其中有2/3在各国租界地居住。

（仁川广域市 历史材料馆 历史文化研究室，仁川历史文化丛书13 译注《仁川开港25年史》仁川广域市印刷情报协同组合，2004年，78-79页）

⁷ 现在研究的著书和论文中所载的清租界地的面积虽然是5000坪，但1914年制作的土地调查簿里，可以知道支那町宅地的总面积是8300坪。

⁸ 仁川市史（1993年）里记录，三里寨地区，两国间没有正式缔结条约，只是仁川监理和清朝领事馆之间制定了协议。但是孙桢睦（1984年）说，这个区域是因为缔结了正式的协定所以更像居住区而不是租界地。

⁹ 孙桢睦，韩国开港期关于都市变迁的研究，一志社（首尔），1982年，150-151页

¹⁰ 孙桢睦，韩国开港期关于都市变迁的研究，一志社（首尔），1982年，152-15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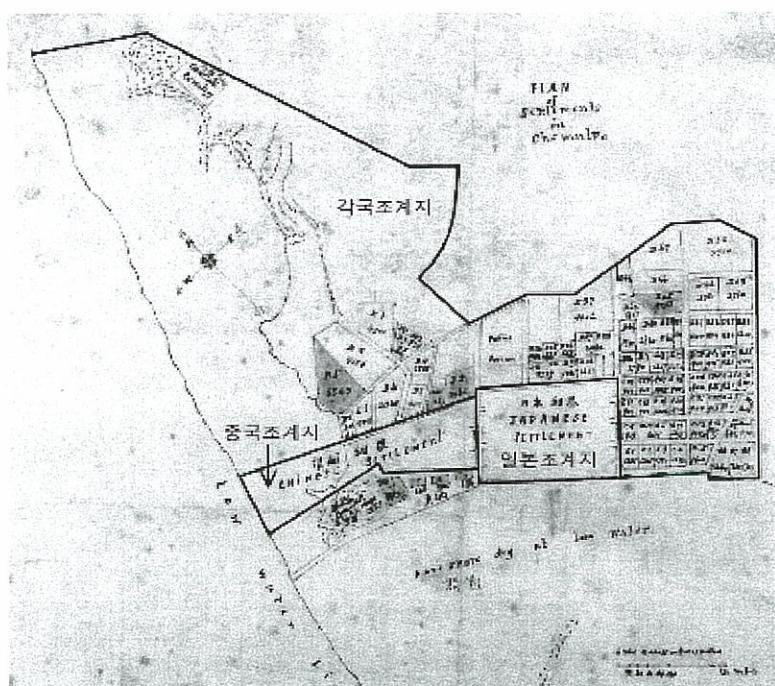


图2 济物浦各国租界地地图（1889年 奎章阁收藏）

各国租界地土地分割时，竞卖的价钱较高，要在游乐设施中抽取营业税，所以当时的财政储备剧增，建立万国公园（现在的自由公园）和英国、俄罗斯、德国的领事馆，在风景很好的鹰凤山山西面还建立了很多西式住宅建筑，从而被称作洋馆村¹¹。各租界地大概分为三等（日本、中国）和四等（各国租界地）。通过发放地权，而将其转化为永久租借地，但这样的地方，要额外付给朝鲜政府地税。但有时候还存在土地被短期禁止使用，土地在被没收的同时，还可能被重新出售¹²。

像前面所说的，仁川的租界地中，日本租界地和清朝租界地比各国租界地的面积要大。仁川在地理上离首都汉城很近，作为汉城的门户，其不单是日本，清朝而且是欧美各国的租界地，进出朝鲜的门户。所以，日本在仁川的影响力远比在釜山和元山的要弱。仁川的开港不同于釜山和元山，釜山和元山基本是为了日本而开港的¹³，而仁川同时也为了清朝及欧美各国，可以被看作是多个国家的势力割据之地。所以仁川与其他航区比国际性色彩更浓。

1910年，日本人入侵朝鲜，实施了韩日合并的政策，仁川的所有租界地都被撤消，以前的开港场从单纯的组团式居住区变成了外国商船的出入港口。从那以后，不论是其他外国人还是日本人都可以不通过任何条约而任意居住和通商，朝鲜丧失了自主权而完全沦为了日本的殖民地。仁川也是同样的命运，租界地于1910年瓦解，清朝租界地也只剩下善邻洞，作为中国人居住区¹⁴。

2. 清人进入和居住区形成

1882年壬午军乱爆发，朝鲜政府请求清朝援助，中国的援军中还有40多名的军役商人同往，这

¹¹ 崔永俊，《开港前后仁川的地理情况研究》，首尔大，硕士论文，1974年，31-34页

¹² Chi, Chengun, 《开港和洋馆历程》海畔文化热爱会，1999年，33页

¹³ 釜山和元山的日本租界地分别是11万坪和9万坪，而且这两个地区与日本较近，所以居住的日本人较多，日本也是其主要的贸易对象。

¹⁴ 推测是1: 1000。各国租界地的边界用红色线表现，各国租界地的土地规划和土地包含户数，等级等也作了详细记录。

也是清国人正式迁入朝鲜的缘起¹⁵。随着《朝·清商民水陆贸易章程》缔结后，陈树棠就任朝鲜商务委员，于1884年与朝鲜政府签订了《仁川口华商地界章程》，从此清国租界地定立¹⁶，这也是清国人大量进入朝鲜的要因。

1883年末，朝鲜的清国商人数已达到72名，1888年上海和仁川间的定期航线通航，促使更多清朝商人迁入朝鲜，到1890年已经增到967名之多¹⁷。据统计1892年，清国租界地内，住户达41户，人口521名之多，从职业构成上来看，官吏47名，商人100名，职工371名，农民22名¹⁸。1894年，甲午海战以后，仁川的清人大多数回国了，只剩下200余名，战争结束后再入朝，人数有所增加。仁川的清商中，大的批发商数量很多¹⁹，他们在汉城和仁川开的店铺每年都在增加。（具体情况见下表）

表2-1 清商的商号

年度	商社
1884年(高宗21年)	華興號，公和順，中華號，永源號，利順號，興谷號，三和順，源康號，成福號，悅來條，雙興號，新泰號，天豐各號(二十四家)，公順興，利泰號，和興順，生盛號
1885年(高宗22年)	華公利，源永號，公盛號，和同號，興福號，興義號，興利號，成信號，同裕號，三泰源，和順號，永來盛，恒豐號，同豐號，聚昌號，裕增祥，廣信號，義興永號，恒順義，公盛號，來盛號，合順號(仁川)
1886年(高宗23年)	廣大號
1887年(高宗24年)	和豐東號，聚興號，和豐號，德盛號，三和興，東來福號
1888年(高宗25年)	永豐號，興昌蒸廠，北公順，奎營蒸廠，永成和，日增機，順昌號
1889年(高宗26年)	同順泰，雙盛泰，登福機(松都)，利生號(松都)，源盛興，衆商號，福源盛(仁川)，謹記號(仁川)
1890年(高宗27年)	麗興號，協記號(中國烟臺)
1892年(高宗29年)	恒富春，和順號，東興號(仁川)，東興隆號，公源興，天順號(仁川)，吉盛號(仁川)
1894年(高宗31年)	怡泰號，吉盛號(仁川)

材料:李兴官,19世纪末,朝鲜的清商活动研究,江源大 硕士论文,2006年,29页

20世纪初，仁川港一带居住的清人中从事棉布及相关行业的商人增多。1800~1893年和1896~1898年，仁川港中国商人棉布店的收入额超过了日本商人。仁川清商开的较大规模的棉布店有源生东，首聚公，东昌兴，仁来盛，永来盛，德顺福，公顺兴，同盛会，双盛泰，泰盛东，锦盛东，义

¹⁵ Cho, Heejong, 《对于在韩华侨的地理学研究》 祥明女大, 研究生院. 硕士论文, 1986年, 8页

¹⁶ 韩国国内的清国租界地，1884年开始在仁川设立，而后1887，1889年，釜山和元山也分别设立了租界地。1885年，进修堂的商务委员归国后523吴长庆将军的官位幕僚袁世凯作为“总理朝鲜常务委员”，处理朝鲜通商业务时，分别在釜山和元山设立的租界地，Park, Hyonwook, 《关于韩国华侨的经济活动和社会的地位的研究》 仁川发展研究院, 2003年, 11页

¹⁷ 上海的商业汽船公司设定了从上海-芝-仁川-牛庄-上海的航线，一年20回往返，为清商运送货物。仁川商工会议所《仁川商工会议所90年》1979年，80页

¹⁸ 仁川文化发展研究院，《仁川府史》 仁川文化发展研究院, 2004年, 1430页

¹⁹ 孙桢睦，韩国开港期关于都市变迁的研究，一志社（首尔），1982年，149页

顺东等22家，其中的仁来盛，永来盛，德顺福，双盛泰可算得上巨商。这些商人大部分是来自山东省，资本的规模可以与日本的店相匹敌²⁰。

由于受到中日甲午海战（1894年）、俄日战争（1904年）、乙巳保护条约（1905年）等的影响，仁川港清朝商人的贸易活动有大的萎缩，但由于清商较高的信誉度²¹，所以基本具有与日本商人竞争的實力，相差并不十分悬殊。由于可以居留的人数有限制，所以不能达到与日本商人相同的数量，从贸易业绩上看，1890年以后开始，日本人的业绩开始增加，清日两国商人在仁川港展开了激烈的贸易竞争。

表2-2 仁川的居留人数比较

分类 年度	韩国人		清人		日本人		欧美人	
	户数	人口	户数	人口	户数	人口	户数	人口
1897	2,360	8,943	157	1,331	792	3,949	24	57
1902	2,257	9,803	207	965	1,221	5,136	33	75
1907	3,227	14,362	414	1,373	2,992	11,467	37	63
1911	3,756	15,978	398	1,505	3,609	15,148	25	70
1917	4,694	19,266	259	1,262	3,056	11,725	19	39
1922	6,601	28,782	322	1,786	2,278	11,099	9	25
1927	9,489	40,085	390	2,077	2,678	11,671	13	32
1931	12,026	51,005	302	1,469	2,655	11,373	20	34

仁川商工会议所，仁川商工会议所 90年史，仁川商工会议所，1979年 84页

表2-3 仁川港清、日商人的输入额比较

年度	总额	清朝商人	日本商人
1885	969,440	242,680	726,760
1886	1,348,406	406,856	941,550
1887	1,468,453	641,340	827,113
1888	1,685,578	636,092	1,049,486
1889	1,885,684	772,037	1,113,647
1890	2,571,832	1,312,614	1,259,218
1891	3,163,507	1,737,044	1,426,463
1892	3,039,819	1,716,231	1,323,588

材料：李兴官，19世纪末，朝鲜的清商活动研究，江源大 硕士论文，2006年，22页

1913年，主要的布务商家是同顺泰，同和东，广和东，德顺福，锦成东，怡成号，裕半德等。²²到1920年中半，仁川港的棉布输入有一定程度的销减。日本侵略时期，人数急剧减少，1919年在政府登记落户的仁川府华侨人数仅739名，1930年又增加到了2427名。1930年，在仁川府居住

²⁰ Park, Hyonwook, 《关于韩国华侨的经济活动和社会的地位的研究》仁川发展研究院，2003年，41页

²¹ 清商由于非常守信誉，所以在韩国商人和顾客中的口碑都很好。所以甲午海战时，清商曾很长一段时间闭店归国，战后归来，商势恢复得很快，比日商的经商姿态要好很多。

²² 林蕙德，在韩华侨的经济史迹考察，庆熙大学 硕士论文，1975年，10页

的华侨中，从事商业活动的人数最多²³，物品销售业者602名，流动摆摊的商人76名，旅馆、餐馆业的商人是257名，理发美容业者55名，其他130名²⁴。

表2-4 仁川居留地在留支那人职业别户数表

职业	户数	职业	户数	职业	户数
官使	4	教師	4	會社員	5
銀行員	1	基督教教師	1	僧侶	1
店員	30	吳服商	11	舶來雜貨	3
雜貨商	20	日用雜貨並に果實	15	藥種商	3
賣藥請賣業	1(兼業)	洋服仕立業	3	支那服仕立業	3
戌克門屋	7	宿屋	11	料理屋	8
飲食店	27	パン商	35	獸肉商	4
運送業	2	理髮業	8	爲替(兩替)業	5
通關業	6(兼業)	野菜商	5	果實行商	3
湯屋	2(兼業)	洗濯業	2	農業(野菜)	135
労働組	12	靴製造業	1	靴修理	2
大工業	4	鋳力商	4	靴下製造	4
錡掛屋	2	貨家業	5	左官業	1
石油行商	3(兼業)	豆腐製造	2(兼業)	釀造業	4(兼業)
菓子製造業	1, 5(兼業)	無職者	21	外國人ボーイ	3
舟乘業	1	石工業	4	总户数	422(23兼業)

材料：朝鮮总督府，「朝鮮に於ける支那人口」，朝鮮印刷股份有限公司，1924年，72～73页

1920年，仁川开始有高级中华料理店。1930年，除了这种高级的料理店还出现了一些小规模餐饮店。这是因为1920年中半开始，仁川港上流的清人劳动者激增²⁵，所以刺激了消费，导致了商业需求增大。由于仁川清商租界地的设立，很多清商移居到仁川，所以仁川港与韩半岛的其他港口都市相比，清人进出数量更多，也是导致仁川清人商业网扩张的要因，仁川清人租界地也就成为

²³ 1930年，很多经商的人后来开始经营农贸，从1920年开始，在现在的新浦市场，“清人蔬菜商”聚集的叫做“蔬菜”的蔬菜专营市场形成了，辛泰法，《仁川的一个世纪》（首尔），1983年，102页

²⁴ 李在正，《韩国华侨的居住地研究：以仁川地区为中心》，庆熙大学硕士论文，1993年，49，60页

²⁵ 20世纪20年代，由于山东省发生内战，干旱后和洪涝灾害，被称作苦力的清国劳动者，为了避难和寻找新的生计，大批的进入韩国，大部分在各种土木工程和建筑工程现场，作廉价劳动力。（孙桢睦，韩国开港期关于都市变迁的研究，一志社（首尔），1982年，151页）。1920年中华料理开始比较受欢迎，特别是普通劳动者可以吃得起，又快捷方便的炸酱面出现了。（仁川广域市，《仁川历史的骄傲》，仁川广域市，2001年，180页）据说最早做炸酱面的店铺是“共和春”。共和春最初是可以提供寄宿的会馆建筑，同时为了给寄宿者提供可以方便速食食物，炸酱面的出现也是非常有可能。但是可以证实共和春是最早的炸酱面店的人已经找不到，所以可信度并不是很高。（仁川广域市 历史材料馆 历史文化研究室《韩国仁川的近代文化之最》仁川广域市，2006年，26页）。中国江苏省也有叫做共和春的餐馆，是叫王学成的人最早开设，为了迎接新民主主义国家的诞生，表达世间万物生机勃勃的意思，而取了春这个字，给餐馆取名为“共和村”（扬州共和春餐饮文化有限公司主页）

了清商活动的主要基地。随着商人的增加，清人选作居留地的支那町一代的8300坪地块已经不能满足居住需要。所以另把三里寨到朝鲜人居住区为止的区域开辟做不断迁入的清人的居住区。

表2-5 主要支那人商店

业务种类	商号名	户数
織物商 ²⁶	德順福，永來盛，和泰公，協泰昌，人和福，和泰號，三合永，聚源和，協興裕，東和昌	21
西洋雜貨商 ²⁷	同順泰，怡泰棧 ²⁸	3
雜貨卸商 ²⁹	仁合東，同春福，誌興東，同盛永，和泰號，德順福，永來盛，協興裕，雙成發，同成號	20
雜貨小賣商 ³⁰	沙敬毓，孫長榮，王振禮，王承？，東盛泰	50
藥材商 ³¹	傳坤山，王玉崑	3
洋服店 ³²	新儉記，源泰，順泰	3
支那料理店 ³³	中華樓，共同春，義生盛	8
支那飲食店 ³⁴	譚受玉，唐述經，王樹嵐	27
戌克門屋 ³⁵	天合棧，春記棧，同春棧，興盛棧，復成棧，元和棧，福仁棧	
旅宿業 ³⁶	仁合東棧	11
爲替取扱業，兌雁商	增泰德，福聚公，裕豐德，萬泰茂，廣和順	

²⁶ 支那町的大规模的织物类输入商有德顺福，（代表：千寿山）永来福（代表：傅守亭），和泰公（代表：杨翼之），协泰昌（代表：王有栋），和泰号（代表：孙金甫），聚源和（代表：林騰九），协兴裕（代表：张殷三），东和昌（代表：姜子云）等。职员数为238名，从1923年的营业科税标准额看德顺福，七十万元，永來盛六十万元，协兴裕四十万五千元，协泰昌四十万元，人和福三十六万元，和泰号三十万元，三合永二十二万元，聚源和十八万元，协兴裕十五万元，其他七万八千元。

²⁷ 贩卖商品舶来食料品杂货，外国烟草，支那产绢织物及诸器具店中，同顺泰和梁来成开创38年，德顺福开创23年，其他的商店也都大概有10年以上的历史了。

²⁸ 同顺泰的本店在京城，各地还有分店，支那人在朝鲜开办的公司中规模最大的一个。仁川分店的科税标准是二万七千元。怡泰棧的科税标准是五万元。

²⁹ 科税标准仁合东，同春福各15万元，誌兴东，同盛永，和泰号，德顺福各10万元，永来盛8万元，协兴裕6万元，双成发五万元，同成号四万九千元，同春福，和泰号，德顺福，永来盛，协盛裕还同时兼织物业。

³⁰ 科税标准沙敬毓，五万元，孙长荣四万元，王振礼二万五千元，王承？，东盛泰各一万三千元。其他大概二，三千元。

³¹ 科税标准传坤山一千五百元，王玉崑六百元。

³² 科税标准新俭记一万八千，源泰七千元，顺泰八千元，新俭记位于支那町。

³³ 中华楼本店的科税标准额是三万元，同兴楼，共同春，义生盛位于支那町，科税标准额同兴楼二万元，共同春就千元，义生盛五千元，其他大概二，三千元。这里共同春好像是共和春的错误表示。

³⁴ 火食铺，包铺，馒头铺等，朝鲜人营业者有所增加。敷岛町的譚受玉，沙町的唐述经，牛角里的王树嵐等较为有名。科税标准额譚受玉二千元，王树嵐一千五百元，其他八百—一千元。

³⁵ 船行客栈商乘支那戌克船运送商品，在戌克门屋休息，同时在门屋进行一定的商品交易。在门屋是荷主和商人出面交易，所以会获得一定的手续费，所以门屋是旅馆兼作贸易中介。标准科税额天合棧6千元，同春棧4千8百元，兴盛棧四千三百元，复成棧三千四百元，元和棧，福仁棧各三千元。

³⁶ 山东的苦力每年增加，为支那人提供住宿服务的旅馆却只有15户。

運送業 ³⁷	興公司, 黃雲川	2
理髮業	徐懷玉, 吳玉山, 復興堂, 王鴻昇	8
支那湯屋 ³⁸	王鴻昇	2

材料: 朝鮮總督府, 朝鮮に於ける支那人, 朝鮮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1924年, 103 ~108頁

3. 仁川的清朝租界地

根据1882年10月签订的《清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的租界设置条款, 陈树棠于1883年11月在统理衙门协办穆麟德(Paul George von Mollendorff, 1848—1901)陪同下对仁川进行考察, 并于同年12月就在仁川设置清朝租界的范围、章程的制定及租界内清朝商人的优惠税收政策等, 向朝鲜统理衙门督办闵泳穆提出了要求。1884年签订了《仁川口华商地界章程》, 仁川租界正式设置。³⁹清朝租界位于日本租界西侧、其它各国租界西南侧的山岭地; 距济物浦很近(图1)。西边长105米, 南边长270米, 东边长126米, 北边长270米, 约9400坪(31 033. 16平方米)(图2)⁴⁰。

根据1885年8月19日日本领事代理久水三郎的报告, 自1884年4月清朝居留地设置以来, 动员汉城的500名清朝士兵进行市区内的地段选择及道路建设, 并着手施工。整个工程大约在1885年3, 4月份准备完毕, 自此, 清朝商人们开始在居留地内建店铺、盖房子⁴¹。称做《仁川支那領事の支那居留地變更要請設計圖》⁴², 图纸收录于仁川附史, 无相关记录, 其他相关根据资料也无法查询。仅有《光绪十一年绘》这个中国年号, 这是驻仁川清国领事因申请清朝专管居留地变更, 于1885年制定的。这张图纸记载了道路宽度, 除日本居留地通往其它各国居留地的主道路宽度为12米外, 其他道路宽度都为8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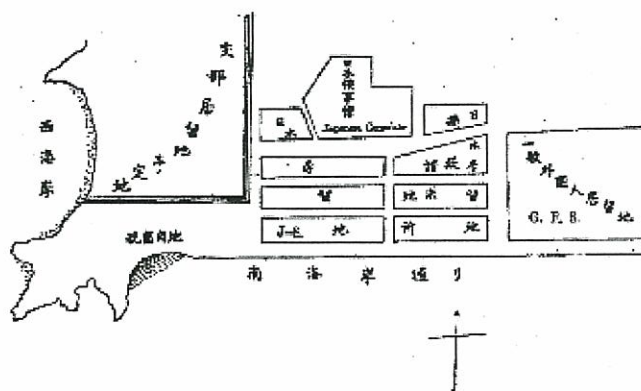


图3 仁川清租界地规划地域

³⁷ 科税标准额, 兴公司一万一千, 黄云川六千元

³⁸ 理发业王鸿升是兼营, 设备不完全, 大部分的客人是支那人。

³⁹ 〈清案〉22, 36—38, 73, 75, 77, 79—80, 90—91页, 谭永盛, 关于朝鲜晚期清明商人的研究, 檀国大硕士学位论文, 1976年, 35—36页

⁴⁰ 陈树棠, 1884年1月15日外交文档, 旧韩国外交文书: 清案1. 文书番号36, 首尔, 高丽大中校东亚细亚问题研究所, 1970. 10, 21—22页; 梁尚湖, 韩国近代の都市史研究, 东京大学博士论文, 1994年, 49页

⁴¹ 梁尚湖, 韩国近代の都市史研究, 东京大学博士论文, 1994年, 121页

⁴² 仁川文化发展研究院, 仁川附史, 仁川文化发展研究院, 2004年, 159页

武汉历史城市保护的发展与原日租界历史建筑的保护与再生

武汉理工大学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 李百浩

一、武汉城市历史演变及其特色

1.1 古代——自最早的汉阳县城和武昌府城，即 2 个古城演变为清末的 2 个古城和 1 个汉口古镇，形成三城镇鼎立之格局。古城武昌、汉阳表现出明显的政治军事的城市性格，而汉口古镇则商贾林立。显然，武昌、汉阳古城是在规划指导下建设的，体现出中国传统的建城思想，而汉口古镇则是自然形成发展起来的。尽管三个古城性质不同，但均建有城墙，只不过古城以防卫人为主，古镇则以防洪水为主。

1.2 近代——1864 年，英国人打开武汉大门，设立了第一个租界城区，于是一个原为中国人居住的传统城镇，开始有了外国人居住和经商，设有 5 国租界，形成了开埠城市，逐渐演变为国际大商业城市。这一时期，武昌、汉阳、汉口、各个租界区各自设有独立的市政机构，各自独立地进行新市区规划建设和拆城筑路的城市改造，并且汉口得到了迅速发展，这也是中国近代从一个小镇演变为巨大城市的特例。

1.3 现代——1949 年后，武汉政体统一，发展工业化战略，使一个商业城市逐渐转型为一个中国中部地区的重要工业城市。随着改革开放，总体规划逐步落实，桥梁、筑造环路、湖泊保护、显山透绿，武汉逐渐成为适宜居住的山水城市。

二、武汉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之发展

2.1 1953 年，武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成立，同期编制的武汉总体规划中，设有“名胜古迹”专篇；

2.2 1986 年，武汉成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其主要文化特色为“近现代史迹型”；

2.3 1984-1988 年，在总体规划中首次增加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专项，提出“一城（商代盘龙城）、两轴线（东西山轴、南北水轴）、四个史迹网（辛亥革命、二七罢工、大革命、抗日战争）、五个保护区（龟山、蛇山、洪山、东湖、汉口旧租借）”的保护体系；

2.4 1990-1996，第二次编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提出“文物保护单位及近代优秀建筑、重点地段、旧城风貌区”的保护层次；

2.5 2005-2006 年，第三次编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严格执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增加了“历史建筑、历史文化街区”等新内容；随着 2008 年《城乡规划法》的颁布，中国逐渐形成建立了“名城、名镇、名村”的三级保护体系制度。

三、武汉市历史建筑保护发展过程

3.1 1992 年前，单体建筑的保护主要指中国传统木构体系的古建筑和具有革命历史的近现代建筑的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

3.2 1993 年，武汉市政府开始保留优秀历史建筑；

3.3 2000 年，在历史建筑保护中，首次增加了近现代建筑群的保护；2003 年，颁布“武汉市旧城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管理办法”和“武汉市优秀历史建筑使用、修缮管理暂行规定”等文件；

3.4 2004 年，市政府颁布“武汉市优秀历史建筑确认暂行办法”以及“武汉市优秀历史建筑档案管理暂行办法”；

3.5 2005 年，国家颁布“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明确了“保护建筑，历史建筑”的概念和保护方式；于是，同年武汉市成立武汉市历史建筑专家委员会；

3.6 自 2005 年后，武汉的建筑保护开始从“规划式保护到单体维护保护”、“纸上文件上的保护到实际工程的保护”、“文物建筑保护走向一般历史建筑保护”、“博物馆式保护走向建筑再生再利用式保护”、“政府主导的保护到市民阶层的保护”、“建筑物质的保护走向文化的保护”等趋势。

四、汉口原日租界历史建筑的保护与再生

1994 年武汉开始认定优秀历史建筑，首次将原租界建筑纳入其中，尤以英俄法租界为最多，原日租界只有 3 栋建筑，即原日本领事馆、三菱洋行、日军军官宿舍。为什么日租界只有 3 栋历史建筑列入其中呢？不是因为数量少，而是因为当时除了对待租界建筑认识上的问题，也没有统一的认定标准，况且未进行过细致的调查。

与汉口其他四个租界比较，日租界的建筑有以下特点：

- 1.公共建筑不多，高大建筑不多，多数为砖木结构的低层住宅店铺；
- 2.外观多为红砖清水墙和水泥砂浆粉饰，机瓦坡顶；
- 3.文物建筑少，大多数为建于 20 世纪 20、30 年代的一般历史建筑，常年未得到维修。

4.1 永清片的武汉天地

永清片作为汉口第一块大规模改造开发的原租界地城区，也是第一次能保留并合理利用历史建筑的旧城改造，尽管不是以“改”为主，但毕竟迈出了第一步。

当时，一般历史建筑怎么保护利用，尚无法定制度，上海新天地成为范型。但是，认识到一般历史建筑要保护已经是一种进步。

肯定的说，原日租界历史建筑的保护再生，至少为周边历史建筑今后的出路，指明了方向。

2002 年，永清片举行了国际设计竞赛，每个方案均对场地上的历史建筑提出了不同的保护方式。2003 年，武汉市规划局提出了“规划设计条件”，规定要保留历史建筑 8 栋，体现历史特点和风貌（实际上当时有 23 栋历史建筑）。这几栋建筑建于 1920 年代左右，属住宅建筑，纵横墙体混合承重，外观有特色。

采取的保护方案有两种：一是，1,2,4,5,6,7 # 建筑的完全保护修缮外观，内部重设，结构加固，使用功能转换；二是，3 # 建筑的局部保留，利用旧建筑元素重新设计，与 1 #、4 # 建筑外观风格协调。在设计过程中，武汉市历史建筑

专家委员会分别于 2005.11、2006.3、2006.4 召开了 3 次咨询审查会议。

目前，一部分建筑已竣工使用，改变了过去旧城改造“只造不改”的局面。

4.2 汉口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

该建筑原为租界时期日华制油会社的两栋社宅，1937 年日本人撤出汉口，同年 12 月 25 日新四军武汉军部成立于此，1938 年以后，成为居民住房，1949-2005 年成为“710 厂”职工住宅，2002 年被公布为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

据现场调查，该建筑可能建于 1910-20 年代年代左右（因为日租界展拓区 1907 年设立，1930 年的日租界地图上已有该建筑），并经过轰炸、火灾等后重建过。A 栋建于 B 栋之后，A 栋 1 个单元 4 户，B 栋 2 个单元 8 户。每个单元均有门廊、门厅、阳台、套间、厨卫等房间，上下单元、左右单元均留有暗门，以便可分可合、互相连通，也许是战争时期的一种防卫逃生的考虑。这种室内有高差的平面布局，如同“玄关、广间、缘侧、押入”的日式布局，并且其尺寸与榻榻米相吻合，可以认为是“近代和洋式”风格住宅。

该建筑 1074m²，两层高，周边砖墙和局部木柱承重，除了厨卫外均为木地板，木屋架、红瓦坡顶，每户设有平顶露台，外墙细石混凝土砂浆粉饰，并有雕花、线脚等装饰。

2005 年开始测绘，2006 年 6 月完成保护修缮方案，12 月正式开馆使用。这是一栋完全按照《文物保护法》修复的原为一般住宅的保护建筑，经历了测绘制图、结构检测、复原设计、施工间勘察、复原修改、结构无损伤加固、细部处理、材料选择等工序，以体现“修旧如旧、整体修缮、延年益寿和真实性、可读性、可逆性”的原则。

结构上，采用钢结构和碳纤维布，形成新的骨架；换掉已腐朽之木楞，并进行防白蚁处理；底层增设防潮布，屋顶增设防水布；拆除扩建搭建部分，恢复原住宅布局，甚至围墙；打通了户与户、阳台与阳台间的暗门，正好为今日展览作为通道；采用地源热泵，以利采暖空调之用。

由于窗子和油漆是损坏最严重的，在施工单位未进现场前，是完全不能确定的。只是当施工单位用脚手架完全将建筑牢牢地固定后，打开已改变的墙体，才能确定真正的“原样”。因此，像这种既无文字记载，又未经长期维修的一般性历史建筑，边施工、边勘察研究、边设计、边修正预算，也许是正常之事。

目前，该建筑作为纪念馆已使用两年余，它的保护修缮与武汉天地的历史建筑再利用式保护，为今后的汉口旧城，特别是其周围的历史建筑保护，起到很好的示范效果。

租界和建筑的研究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 徐苏斌

十分荣幸受到本次会议主办者的邀请，其实我自己正在从事天津租界的调查和保护工作，深感这次会议对今天的中国租界保护工作十分有意义，同时对我正在从事的工作也有指导意义，衷心感谢主办者给我这样的学习机会。

一 为什么今天，租界建筑

“探索租界研究的新的可能性”，我理解这不是一个纯粹理论意义上的探讨，而是今天直接面对中国经济开发中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实际课题。我 2006 年从日本来到天津，深感研究的环境再不是在日本那种相对安定的研究环境了，城市开发问题迎面扑来，不容回避。1986 年天津被定位为历史文化名城，其中划分了 12 个保护区，主要是租界。这些保护区本来已经是租界里的一小部分，但是每天都面临着被拆除的危机，特别是日租界。过去往往和政治有关，但是目前还不完全是政治问题，我认为更重要的原因是研究滞后，我们研究者不能拿出对街区以及每一个建筑价值评估的有效证据，不能为指定和保护规划提供依据，很多建筑在一夜之间就拆掉了。租界建筑研究目前是一个迫在眉睫的研究课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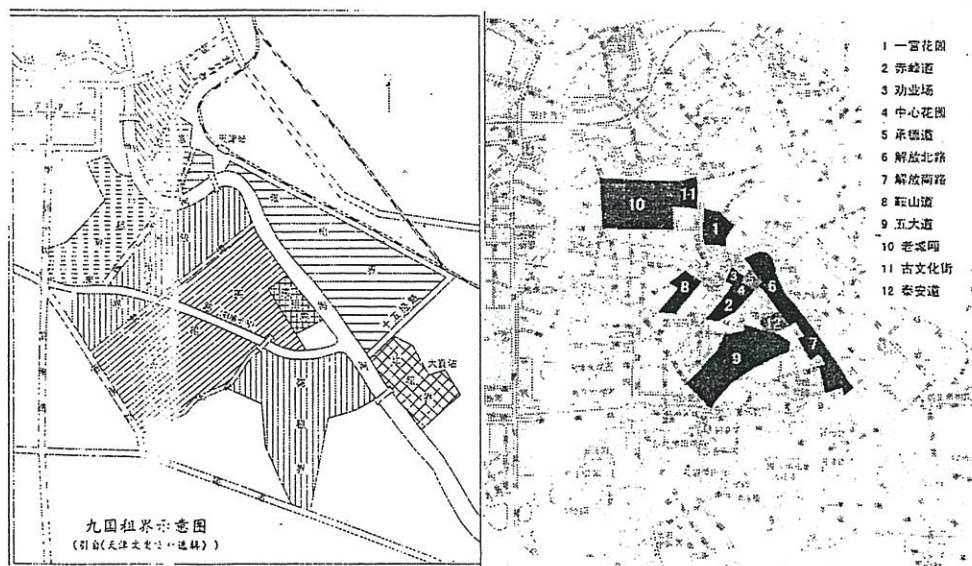


图 左：天津九国租界 右：现在天津的历史风貌建筑保护区

二 关于中国近代建筑保护的简单回顾

中国在划分文物中没有“租界建筑”的划分，我们常用“近代建筑”表示包括“租界建筑”在内的概念。

❖1988 年 11 月 10 日，建设部、文化部联合发出《关于重点调查保护优秀近代建筑物的通知》

❖1988年清华大学和日本东京大学合作展开了中国近代建筑的普查，启动了中国16个近代城市的近代建筑普查

❖1989年将天津作为第一个近代建筑普查的对象开始了大规模的中国近代建筑普查，出版了《中国近代建筑总览——天津篇》

❖1991年在北京召开了“近代优秀建筑评议会”，提出了《专家建议近代优秀建筑名单》，包括96个近代建筑项目。

关于近代建筑件数的规定，第一次全国重点文物指定(1961年)、第四次(1996年)和第六次(2006年)比重较大，分别为18.3%，20%，19.1%。

第一次侧重于革命性建筑和纪念地，第四次则增加了代表性建筑的比重，第六次则以代表性建筑为主，并增加了工业建筑。到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止文物总数有2351件，其中近现代遗产有380件，其中革命纪念地157处，纪念性建筑88处，代表性建筑129处，工业建筑6处。反映近代建筑的指定数量还是占很小比例，而大量近代遗产不在法律的保护之下。而这些建筑集中于城市，处在经济开发的最前线。

三 关于四位教授的研究

罗苏文先生的研究“时代的符号，文明的印记——晚清上海、天津租界欧美建筑文化遗产初探”认为租界是晚清条约口岸辟设的外侨自治行政辖区，也是近代中国大陆城市化推进的先行地，欧美建筑文化输入的主要窗口。作者将着眼点放在晚清欧美建筑文化输入的文化条件是什么？创造出什么样的人文环境，对推进中西文化接触有何影响？作者将历史学研究和建筑学研究结合在一起探讨了建筑的价值。本人认为该研究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基础研究，基础研究是文物指定，保护和修缮工作的基础。

富井正实先生的“在中国和韩国的旧钟纺社宅地的调查报告”横跨了东亚的空间，将日本，朝鲜和中国联系起来进行比较研究。作者选题定位于工业遗产，工业遗产的研究是东亚近代遗产研究最薄弱的环节，而且起步较晚。2006年中国在无锡发表了《无锡建议》，全面揭开了工业遗产的研究的序幕。2006年第6次全国重点文物指定才出现了6件工业建筑。2008年12月在福州召开了中国工业建筑遗产国际学术研讨会，提议对中国的工业遗产进行普查，目前这项工作正在推进。作者的研究基于大量的田野调查，而且在资料的运用灵活运用了历史资料和航拍和卫星资料。另外，作者注目于工业建筑总体规划，将工业建筑中具有人性化的社宅部分作为研究的重点，展现了工业建筑的多元性和社会性。

韩东洙先生的“仁川日本与清国租界地”研究了东亚多国之间有关租界地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特别是清国租界地的研究似乎以前很少见过，我认为作者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向我们展现了亚洲租界历史的另一个面。这是作者现场调查和历史调查相结合所完成的精致研究。最后作者根据历史资料复原了清租界地土地所有的状况，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具有商买气息的清租界。

韩东洙先生的专业虽然是建筑史，但是可以看到作者的研究有意识向非建筑领域的发展。

李百浩先生的“武汉历史城市保护的发展与原日租界历史建筑的保护与再生”梳理了武汉城市历史的演变，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之发展，历史建筑保护的发展，最后聚焦于日租界历史建筑的保护与再生的具体实例进行分析。中国目前对于近代建筑的修缮没有统一的规范，各地各设计者分别进行探索，本来近代建筑是千姿百态的，因此修复也应该因物而异，但是在遵循真实性原则方面以及在同等类型租界建筑的修复方面是可以互相借鉴的，天津的日租界已经完成了溥仪的住宅静园的修复，下面马上要展开段祺瑞住宅的修复以及日租界的保护规划，李百浩先生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参考系。当然也为其他城市的日租界建筑修复提供了参考。

各位先生虽然各有特色，但是给我们一个综合印象是：（1）在租界建筑研究方面他们共有国际化的视野，是跨国界的研究。（2）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跨学科研究的特点。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事业，本次研究会的构成也是试图反映这样的意图。



图 天津大学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国际研究中心调查天津日租界，并进行测绘，为下一步保护规划做准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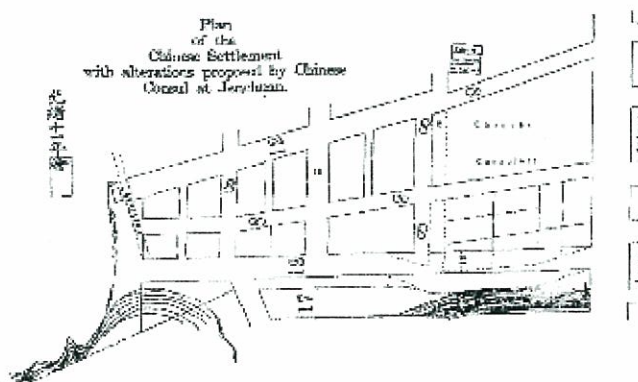


图4 仁川清租界地的变化图

1886年10月，仁川清朝租界的宅地通过竞贷入札向清朝商人拍卖。（记录见表2-6）。通过《仁川港华商租界毕公拍租价计开》可以知道各地段的租价及购买者。来看，相同等级的土地中土地地号有重复出现。因为没有留下图纸，所以想了解他们的准确位置比较难，只能了解其中上等地12块，中等地20块，下等地7块，总39块地，共1529.925方二米突⁴³（6119.7m² = 1853.67坪）中标。其中每平方米的最高中标价为上等地2两6钱3文，中等地2两4钱，下等地2钱1文。

按照仁川港华商地界章程的规定，从1886年12月15日征收的地税表(表2)仁川港华租地税成册中可以看到，缴税的地块中上等地段26个，中等地段32个，下等地段15个，总计72个，总面积为3112.188方二米突（12448.752平方米=3770.75坪）。具体按上等4钱，中等3钱，下等2钱的比例⁴⁴进行征收，税收总额是981两6钱6文，其中的三分之一1327两2钱2文交给朝鲜政府。

通过对基本情况的调查了解到，1885年8月4日，在清朝居留地宅地竞贷入札过程中，清朝人居然将土地一次性购入。每平方米的最高标价为1等地段25美分，2等地段15美分，3等地段10美分。这比日本专管居留地的标价要低。还有，尽管1、2等地段全部中标，但3等地段却剩下近半数⁴⁵。但是，1886年12月从清朝商人那里的总收税面积为12448.752平方米，与清租界总面积31033.16平方米相差很大。这表明，到1886年12月为止，清租界总面积中仅有约40%通过拍卖中标，剩下的60%于何时中标则无法得知。1910年编制的仁川清国专管居留地面积簿所记录的总面积27071.72平方米（8200坪）和土地调查簿记录的面积基本相近，通过这一点我们近可以推测，1910年以前，几乎将所有的宅地都租借给了清朝商人。

这个面积簿是通过土地调查局技手日高仙吉和郑南奎的测量数据整理的，后又通过这个统计数据

⁴³ 根据仁川开港当时的条文规定，使用“二米突四方”作为面积单位。因为当时东亚人不清楚1平方米面积单位，西方人则不知道1坪的面积单位，所以采用了折衷方法。即，在使用“米法”的同时，也使用与1坪相近的面积单位“二米突四方”。根据这个，东亚和西方人对面积单位换算的认识差异可以逐渐缩小。梁尚湖，韩国近代の都市史研究，东京大学博士论文，1994年，46页。

1平方米面积纵横各1米，“二米突四方”面积纵横各2米，所以二米突四方等于4平方米。本论文分别用“二米突四方”、“方二米突”及“[二メートル平方]”。本论文中分别使用“1坪=3.3014平方米”和“二米突四方=4平方米”的面积单位表示。

⁴⁴ 可按1两=100文，1钱=10文来进行单位换算。梁尚湖，韩国近代の都市史研究，东京大学博士论文，1994年，111页，112页

⁴⁵ 1885年推定市价按600文=1圆=78美分的基准，1平方米：25美分・15美分・10美分—4平方米：1美元・60美分・40美分—1圆28钱・77钱・51钱—768文・462文・306文。日本居留地每4平方米的最高得标价为1675文。梁尚湖，韩国近代の都市史研究，东京大学博士论文，1994年，111页、122页

绘制了仁川清国居留地实测平面图⁴⁶（图2-5）。这个图还被作为1910年日本统监府外务部长小松绿和大清国驻扎韩国总领事官马延亮缔结《仁川·釜山·元山 清国居留地规定》时的参考资料。

表2-6 仁川清国专管居留地测量预算明细表

项目	明细	金额
路费	往返 2人, 单程 1元 32钱	5元 28钱
	汉人, 住宿费 1元, 一对 50钱/ 12人	18元 00钱
	一般人, 住宿费 3元, 一对 1元/ 12人	18元 00钱
小计	-	71元 28钱
人力费(人夫赁)	一般人, 1日 1元 支付/ 12日	12元 00钱
	汉人 3人, 1日 50钱 支付/ 12日	1 8元 00钱
	往返汽车赁 4人, 1人 75钱	6元 00钱
小计	-	36元 00钱
小物品费	-	5元 00钱
总额	-	112元 28钱

材料: 总督府 记录 CJA0002264, 国家记录院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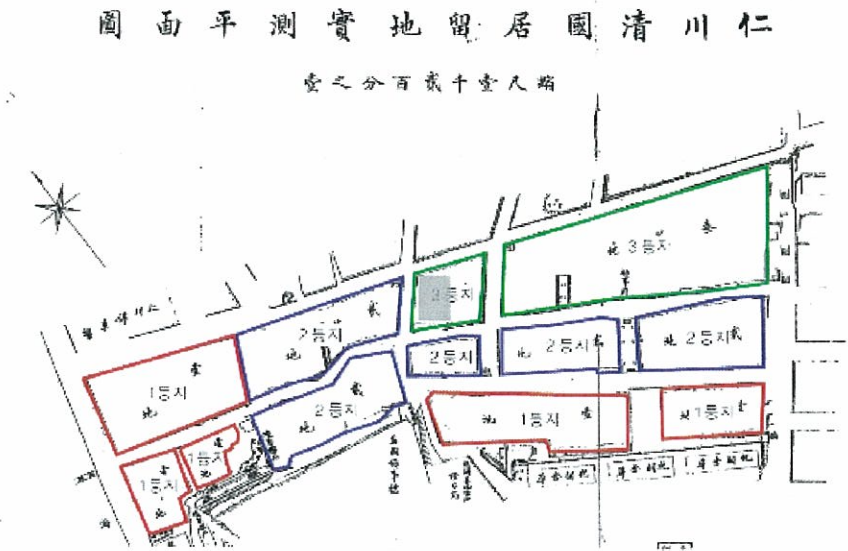


图5仁川清租界地测绘平面图（1909年，总督府 记录物 CJA0002264, 国家记录院收藏）- 共和春位置

从测绘图来看，仁川清租界地由12个街区构成⁴⁷，虽然分为1等地、2等地和3等地，但这只是初步测量的的清租界地地图，不能了解更加详细的规划构成。1913年朝鲜总督府决议要画清国租界地的地图，计划首先绘制这个平面图然后进行后续工作，于1913年完成。区域总面积为27428. 03m²⁴⁸（8, 3

⁴⁶ 总督府 记录 CJA0002264

⁴⁷ 街区：街路贯通的范围，是城市规划中土地利用，人口、土地分配、交通、行政管理的单位

⁴⁸ 日本人对清朝租界地的土地测量，首先调查海畔所有者，进行非常精确的测量也是为了更精确地了解土地的情况和界线，这样对确立房地产的管理体系的设立有辅助作用。

08坪)，由大小不一的57个地块构成。三条东西向道路，将整个地块分成8个街区。57地块中细长型的为1等和2等地段，清国领事馆周边丘陵地带以北的街区则为3等地段，一般规划成较大面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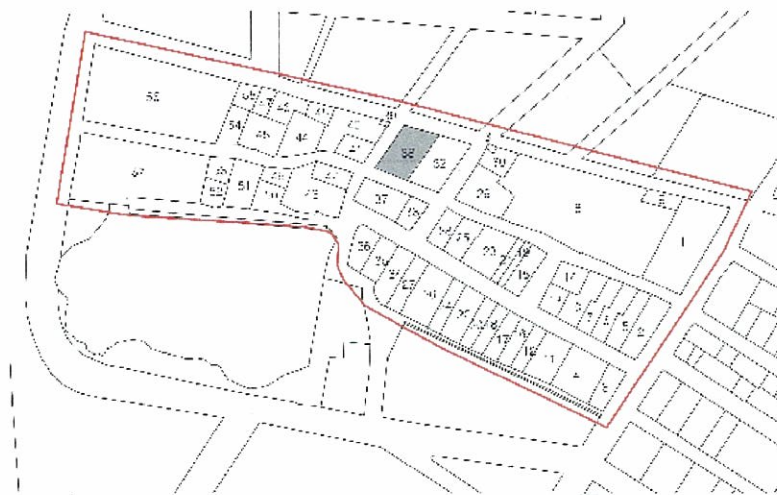


图6 清租界的地块和番号（1913年地理原图）- 共和春位置

仔细查看土地调查簿可以看出，土地所有者既有以公司名义的也有以个人名义登记的。而1914年的土地调查簿中，只能看到个人名义的土地租赁。通过土地调查簿了解到，清租界的57块地中，除3块(8, 31, 39番)以外，其他54块地全部为清国商人所有。其中有7块地(12, 24, 29, 32, 37, 40, 44番)归同顺泰老板谭杰生所有，怡泰栈老板梁绮堂和张声甫各有5块。拥有2块以上土地的商人有10多名。可见，当时清国人租用仁川港的土地主要用于商业活动。

第51号地快是英国商人 ‘Chemulpo Cigarettes & Co.’ 公司的仁川分公司，在这里进行烟草加工⁴⁹。依照仁川口华商地界章程，清国领事馆在三等地的第8号地块建立，1903年左右，俄罗斯人在56号地块建了二层灰砖结构建筑，俄罗斯领事馆。清人梁绮堂在12号地，开了专门对外国人开设的高级旅馆怡泰棧 (Steward Hotel)，与街对面的日本开的大佛饭店互相竞争。

⁴⁹ 仁川文化发展研究院，《仁川府史》，仁川文化发展研究院，2004年。597页